一五一十 周刊

NO. 135
2013年12月13日

张大军：专制统治术、心灵的自由与非暴力抗争 | 黄卧云：回到曼德拉：非暴力主义的真伪 | 《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重新审视“非暴力抗争”



编者的话

曼德拉逝世。在甘地、马丁·路德·金之后，曼德拉被视为世界各地非暴力抗争者的精神领袖。然而，对于他们而言，非暴力抗争的意义并不相同。本期周刊，我们从曼德拉出发，探索非暴力抗争之路，呈现其背后的复杂性。

在曼德拉的一生中，争取种族平等的使命感从未磨灭。但他并非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也不是教条的空想家。他的最终目标是让白人登上汽轮自愿地离开非洲大陆。怨恨和报复对他来说，都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当革命的战火以正义之名蔓延，很多抗争者选择了非暴力。张大军认为，自由的心灵可以期待武力制服暴政，但当所谓正义之师在历史中的角色如此模糊虚幻，非暴力抗争便成为一种现实选择。马丁·路德·金则通过深入探索甘地哲学，越来越认识到“爱”在社会变革中的力量。

然而，并非每个非暴力抗争者，都是无条件爱世人的天使。对甘地而言，非暴力并非被动忍受和呼吁。而是公开违法，勇敢的面对暴力，承担被逮捕、监禁甚至长期迫害。他相信抵抗者的从容受难，会开启压迫者被蒙蔽的双眼。但这种抗争是有条件的，如果压迫者毫无底线，无视抗争者的牺牲，以暴抗暴就无法避免。

60 年代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黑人在非暴力抗争中大量死亡，却并没有触动白人政权，运动陷入僵局。“自由之夏”，正是行动者们决定，只有中产白人精英的子女和他们并肩作战，甚至牺牲，才可能增加影响力的尝试。《自由之夏》这本书，以详实的口述资料向后来者展示，非暴力抗争所付出的代价，和背后巨大的阴影。它不是明亮轻盈的青春之歌，今天美国的种族平等，应该记住这些白人少年的身影。

在策略上，非暴力也只是这种抗争手段的一个面向。相比革命者，非暴力抗争者并非因为懦弱，也不见得更高尚，很多是出于现实策略的考量。《论战略性非暴力冲突》一书的第四章和第七章，详细分析了不同情境下的机制、方法和考虑因素。周刊的最后，《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用丰富的历史事实，呈现出非暴力抗争的能量。同时，我们也整理了 20 世纪以来，重大的非暴力抗争事件，作为补充参考。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周刊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引】

比尔·凯勒：解放者曼德拉：从囚徒到总统



“

我对白人、而不是对种族主义感到愤怒。我虽然不准备把白人都扔进大海里，但我会高兴地看到他登上自己的汽轮，自愿地离开非洲大陆。

”

比尔·凯勒，《纽约时报》前执行主编。

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这位把南非从白人少数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领导者、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尊严与克制的国际象征，周四离世。享年 95 岁。

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宣布了曼德拉的死讯。

长期以来，曼德拉一直明确表示他希望悄然离世，然而他在比勒陀利亚(Pretoria)一家医院的最后几周却充满了喧嚣，既有家庭成员的争吵、新闻媒体的追逐、寻求公众注意的政客的叫嚷，也有南非举国上下的爱戴与痛失感的流露。民众的守夜活动甚至让奥巴马总统对该国的访问黯然失色。奥巴马向曼德拉献上了敬意，但决定不去打扰这位行将辞世的人，这位奥巴马眼里的英雄。

按照曼德拉的遗愿，他将被安葬在养育他长大的库努村(Qunu)。根据法庭裁决，他的三个已故子女的遗骸已于 7 月 4 日移葬在那里，使一桩广受媒体报道的家庭纠纷得以解决。

曼德拉对自由的追求，让他从部落酋长的宫廷走出来，参加到地下解放运动中，也在监狱采石场度过许多时光，最后走进了非洲最富有国家的总统府。与许多他被视为志趣相投的成功革命家不同，他婉拒了第二个总统任期，高高兴兴地把权力交给了选举出来的自己的

继任者。南非虽然仍面临着犯罪率高、贫穷、腐败与疾病等各种问题，但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它在世界上受到尊重，也处于显著的和平状态。

人们最常问的有关曼德拉的一个问题是：在白人有组织地凌辱了他的人民、虐待和谋杀了他的许多朋友，并将他囚禁狱中长达 27 年后，他是如何能如此坚定地不怀怨恨？

当他终于赢得了执政的机会后，他组建的政府是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不大可能的融合体，其中囊括了许多以往压迫过他的人。就任总统时，他邀请了一名看守过自己的白人狱警出席他的就职典礼。曼德拉克服了对前任白人总统德克勒克(F. W. de Klerk)的个人疑虑乃至厌恶，与他分享了权力与诺贝尔和平奖。

在 1994 年至 1999 年担任总统期间，他花了大量精力去缓和黑人选民的怨恨，同时让白人放心他们不会遭到报复。

曼德拉之所以毫无怨恨，至少部分原因在于，他在革命家和道义异见者中属于极其罕见的那种：他是一个能力卓越的政治家，愿意在政治上作出让步，不喜欢教条主义。

2007 年，《纽约时报》为撰写这个讣告而采访曼德拉时曾问他，在遭受了如此野蛮的折磨后，他如何能够抑制仇恨？他几乎不屑一顾地回答说，仇恨搅乱人的头脑。它妨碍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一个领导者承担不起仇恨的代价。

除了年轻时曾短暂地主张过黑人民族主义外，他似乎真诚地超越了撕裂南非的种族激情。曾与他共过事的一些人说，这种显而易见的宽宏大度对他来得非常自然，因为他一直把自己看作优于迫害他的人。

在担任南非总统的五年中，曼德拉虽然在海外仍保持着圣人的形象，他的光环却在国内变得有些黯淡。他勉强地将南非分裂的民众集结在一起，并努力将派系林立的解放运动转变为一个可以信赖的政府。

一些黑人，包括在怨气最大的黑人群众中拥有很多追随者的前妻温妮·马迪基泽拉·曼德拉(Winnie Madikizela-Mandela)，抱怨他在缩小占人口多数的贫困黑人与占人口少数的富裕白人之间的巨大差距上行动太慢。一些白人则说，他没能控制犯罪、腐败和任人唯亲问题。一些黑人离开了政府去赚钱；一些白人则带着资本和知识移民他国。

的确，曼德拉对执政的具体细节变得不那么上心，将日常事务交给他的副手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后者在 1999 年接替他成为总统。



但是，他的国人中很少有人怀疑，如果没有他家长式的权威和政治上的精明，南非在发展成为一个不完善的民主国家前，可能早就陷入内战。

在离开总统职位后，曼德拉运用他的道义声望在非洲大陆其它地方帮助缔结和平，推动更多的外国投资。

一个”闹事分子”的崛起

曼德拉在服无期徒刑期多年后受到世界注意，成为反种族隔离（apartheid，该词在南非荷兰语中的意思是“分开”）的象征。它是一个以种族划分选区的系统，由此剥夺黑人的公民地位，把他们限制在类似保留地那样的“家园”和城镇里。

大约 1980 年左右，反种族隔离运动中最重要的组织、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流亡领导人决定，这位能言善辩的年轻律师是其运动的完美英雄，他能让非国大反种族隔离运动变得人性化，那种制度让 80%的南非人对自己的事务没有发言权。已经在南非国内作为解放运动圣歌的《释放曼德拉》，成了上英国流行榜的歌曲。展示曼德拉面孔的牌子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美国学生的集会上，学生们集会要求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实行贸易制裁。

曼德拉在 1994 年出版的自传《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中对此表达了些许惊异，他说这些人都不知道我到底是谁，就把我变成了世界上最出名的政治犯。也许是出于顽皮的幽默，他声称有人告诉他，当"释放曼德拉"(Free Mandela)的海报出现在伦敦时，许多年轻的支持者以为“释放”(Free)是他的教名。

不过在南非，以及在国外那些更了解南非事务的人当中，纳尔逊·曼德拉已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名字。

他于 1918 年 7 月 18 日出生于一个只有牛、玉米和泥屋的小村庄姆维索(Mvezo)，姆维索位于当时属于英国保护地的特兰斯凯(Transkei)的丘陵地区。他的本名叫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Rolihlahla Mandela)，他喜欢指出，这个名翻译成口语就是“闹事分子”的意思。根据他的自传，他七岁上学时，一位老师给他取了如今这个人们都知道的英文名。他的父亲葛德拉·汉瑞·孟伐肯伊斯瓦(Gadla Henry Mphakanyiswa)是科萨族分支腾布人的一个部落酋长。

纳尔逊还是婴儿时，他的父亲因为不顺从被一位英国地方长官剥夺了酋长地位，作为儿子的他十分情愿地声称，他继承了父亲骄傲而固执的脾气。



九年后，纳尔逊的父亲去世，他被腾布人最高酋长接收到家中，不是作为权力的继承人，而是得以观察权力的运作。他后来成为一个老成持重且西化的人，但他的一些最密切的朋友总是将他君王般的自信以及他偶尔表现出来的专断行为归结于他在一个王族家庭长大的经历。

曼德拉似乎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与任何人都平等的地位。这与许多南非黑人不同，他们的信心被官方世代宣称的白人优越论所摧毁。与曼德拉囚禁在同一监狱、属于他身边圈子的艾哈迈德·卡特拉达(Ahmed Kathrada)说，“关于曼德拉，你要记住的第一点是，他来自一个王族家庭。这总是给了他一种力量。”

曼德拉在自传中回忆偷听部落理事会没完没了的讨论、以寻求共识的情景。他注意到，酋长的工作“就像一个牧羊人”。

“他跟在羊群的后面，”曼德拉继续写道，“让腿脚最灵便的走在最前面，于是乎其他人跟上来，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一直被牧羊人从后面引导着。”

这后来也成为曼德拉作为领导人和总统的风格。

曼德拉一生中都与腾布部落王族家庭保持了密切关系，这个部落构成重要的特兰斯凯(Transkei)地区的一个人口众多、具有影响力的选区。他在那里的背景赋予了他对南非部落政治的有益洞察力。

最重要的是，这种背景帮助他处理人口众多的祖鲁族内部致命的分裂 。这一分裂的根源在于非国大与因卡塔自由党(Inkatha Freedom Party)之间的权力斗争。虽然许多非国大领导人妖魔化了因卡塔领导人曼戈苏图·布特莱齐(Mangosuthu Buthelezi)，曼德拉还是把他纳入新的团结政府，并最终平息了暴力。

曼德拉在一次采访中解释说，维持祖鲁民族和平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布特莱齐是在祖鲁王室中长大的，但他是个侄子，不在直接继承人之列，这使得他对自己的地位有着深痛的不安全感。解决办法就是去爱他，直到他接受你。

加入运动

在卫理教会传教士学校和海尔堡大学(the University College of Fort Hare)，曼德拉的视野开始拓宽。海尔堡大学当时是南非唯一的黑人住宿学院。曼德拉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说，他进大学时仍视自己首先为科萨人，毕业的时候他则具备了更广阔的非洲视野。



在海尔堡大学学习法律期间，他结识了另一位未来解放运动领导人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他们两人 1940 年因为一次学生抗议而被停学，之后被遣送回家，差点被开除。许多年后，曼德拉回忆起这件事来时说，出于一个次要原则而不愿屈服，其实是“愚蠢”的。

回到村里后，曼德拉发现他的家人给他选了一个新娘。他对那位女子不感兴趣，对一生从事部落管理事务更加不感兴趣，于是他逃离家乡，去了黑人聚集的都市索维托(Soweto)。当时大批年轻黑人背井离乡，到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附近的金矿工作。

在索维托，他被人介绍给了房地产商、在非国大中十分活跃的沃尔特·西苏鲁(Walter Sisulu)。西苏鲁在一次访谈中回忆道，他看到这个高个子、带着贵族气质、眼中透着自信的年轻人，立马感到他的祈愿灵验了。

很快，曼德拉以其能赢得怀疑者信任的能力，令其他活跃分子刮目相看。西苏鲁说，“他的起点总是，‘不管怎样，我都要说服这个人’。这是他的天赋。不管接触什么人，不管去哪里，他都带着这种自信。就连他没有充分的理由时，他也能让自己确信他有。”

虽然从未完成法律学位，但是曼德拉与坦博开设了南非第一家黑人律师事务所。他还学习业余拳击，天不亮就起来去跑长训练。又高又瘦的曼德拉还有点虚荣。他的着装完美无暇，他对时装的注意多年后将显现在成为他个人标志的优雅、鲜亮、宽松的非洲布衫上。

不耐烦非国大长者的看似无能，曼德拉、塔博、西苏鲁和其他不安分的激进者组织了非国大青年团。他们发表了一份宣言，其泛非洲民族主义之强烈，令他们的一些非黑人同情者感到不舒服。

非洲主义还是非种族主义：在当时的解放思考中，这是最大的分歧所在。黑人觉醒运动（其最著名的烈士是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认为，在非洲人能够在一个多种族社会占一席地位之前，必须首先重建他们的信心与责任感。

有一段时间，曼德拉也被这种自我满足说所吸引。

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对白人、而不是对种族主义感到愤怒。我虽然不准备把白人都扔进大海里，但我会高兴地看到他登上自己的汽轮，自愿地离开非洲大陆。”

由于坚信黑人应该自己解放自己，他加入朋友的行列，冲击了共产党的会议，因为他把共产主义视为舶来品，不是非洲的意识形态，还有一段时间，他坚持非国大与印度人以及混种人的政治运动保持距离。



“这是那时候年轻人中通行的做法”，西苏鲁多年后说。但他说，曼德拉从来不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也不是任何一种教条的空想家。他是个行动者。

他也已经是一位大胆的自信者。

与曼德拉在非国大青年团一起工作过的乔·马修斯（Joe Matthews，他后成为对手因卡塔运动中一个温和的声音）1952 年曾在一次正式晚宴上听过曼德拉讲话，马修斯预言，他将会成为自由南非的首任总统，这在当时的听众看来相当傲慢。

“他不是个理论家，而是个行动者，”马修斯在接受电视记录片节目“前线”的采访时说。“他是个干事的人，他是个随时准备第一个志愿去做任何危险或困难之事的人。”

成立青年团五年后，这些年轻一代的反叛者策划从老一代人手中取得了非国大领导权。

在索维托担任年轻律师的年代，曼德拉与年轻的护士伊芙琳·恩托科·梅思(Evelyn Ntoko Mase)结了婚，他们一共生了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只活了九个月。然而，他的政治活动，使得他与家人聚少离多。还有一个因素加剧了他们的紧张关系，那是他的妻子加入了耶和华证人会(Jehovah’s Witnesses)。这个教派禁止会员以任何方式参与政治。他们的婚姻越来越冷淡，最后突然终结。

“他说，‘伊芙琳，我感到我对你不再有爱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多年后在一部记录片访谈中回忆说。“我把孩子和房子都给你。”

之后不久，一位朋友介绍他认识了诺查莫·温妮芙里德·马迪基泽拉(Nomzamo Winifred Madikizela)，一个比他小 16 岁、风采出众、意志倔强的医疗社会工作者。曼德拉对她一见钟情，在他们首次约会时就宣布要娶她。1958 年他娶了她，当时他和其他几位反种族隔离的活动分子正因叛国罪接受马拉松式的审判。他的第二次婚姻是一场动荡不宁的结合，他们生了两个女儿，也在全国的瞩目之下，上演了一场被迫分居、献身、悔恨、乃至敌对的戏剧。

转向激进

1960 年，警察在一个名叫夏普维尔(Sharpeville)的小镇枪杀了 69 名和平抗议者，将非暴力解放运动的耐心推至极限。一年后，曼德拉领导非国大走上了武装反叛的新道路。



对曼德拉来说，这是个突然的转变，因为不久前他刚宣布，非暴力是非国大不可违背的一项原则。他后来解释说，我们不是出于道义原则、而是出于战略才发誓不以牙还牙；使用一个无效的武器没有任何道义原则可言。”

以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游击战》为课本，曼德拉成为解放军的首位司令。这支军队的人马杂七杂八，但却有一个显赫的名字：“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

尽管曼德拉一生都否认，但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大约是在这时，他短暂地加入过南非共产党，后者是非国大转向武装抵抗的伙伴。曼德拉加入共产党，据信是为了利用共产党与那些愿意为暴力抵抗提供资助的共产党国家的关系。英国历史学家史蒂芬·艾利斯(Stephen Ellis)2011 年发现的一份共产党秘密会议记录中，提到了曼德拉的党员身份。他说，曼德拉“不是真正地改变了信仰；那只是一种投机行为”。

曼德拉的“武装斗争”尝试多少有点被神话了。在他作为从事惊险活动的不法之徒的那几个月里，媒体称他为“黑花侠”(The Black Pimpernel)。然而，尽管他接受了游击战训练，并竭力为民族之矛寻找武器来源，他却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真正的战斗。非国大的武装活动基本上仅限于埋地雷，炸电站，还偶尔有过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活动。

在南非举行了首次自由选举后，民族之矛承认在自己的训练营地发生过践踏人权的事件，其声望因此受到损害。不过并没有证据显示曼德拉个人被牵连到这些事情中。

审判期间，传奇成形

南非统治者决意要让曼德拉及其同志们失去战斗力。1956 年，当局以叛国罪指控逮捕了他和另外几十名异见者。但是由于检方的失误，曼德拉被判无罪。之后他转入地下。政府再次抓获了他，指控他煽动罢工以及没有护照而试图出国。庭审的第一天，他穿着科萨人传统的豹皮斗篷进入法庭，意在显示他是一个踏入白人辖区的非洲人。曼德拉的传奇从此得以一步成形。

那次审判的结果是，他获刑三年，但这只是主要事件的前奏。接下来，曼德拉和另外八名非国大领导人被指控破坏并策划推翻国家，两项指控均为死罪。这次审判被称为瑞佛尼亚审判(Rivonia Trial)，瑞佛尼亚是被告人策划行动的农庄名字，当局在那里找到了大量罪证文件，其中许多为曼德拉手书，概述暴力推翻种族隔离政权的理由与行动方案。

被告人明确知道他们将被定罪，在曼德拉的建议下，他们把庭审变成了一场道义戏剧，在世界舆论法庭上为自己辩白。他们承认组织了一支解放军，从事了破坏活动，他们试图为



这些行动提供政治依据。在他们之间他们达成一致，即使被判绞刑，出于原则，他们将拒绝上诉。

曼德拉在法庭上发表了四个小时的开庭辩护演说。这是他毕生最慷慨陈词的演说之一，他的授权传记作者安东尼・桑普森(Anthony Sampson)认为，这个演说不仅确立了他作为非国大领袖的地位，而且奠定了他作为国际反种族隔离运动领导人的地位。

曼德拉描述了他从被黑人民族主义所诱惑、到热心多种族政治的个人演化过程。他承认自己是民族之矛的指挥官，但他坚称，只是在非暴力抵抗无效的情况下才转向暴力的。他承认与共产党人结盟——在那个谈虎色变的冷战时代，这是起诉方最有力的一个指控——但他将其比作丘吉尔与斯大林建立的反对希特勒的合作。

在结束语中，他陈述了自己的信念，他的这段话作为一段最精彩的雄辩留在南非的历史上。

他在法庭上说，“我为反对白人统治而斗争，也为反对黑人统治而斗争。我怀有一个建立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美好理想，在这个社会里，人人和睦相处，机会均等。我希望为这一理想而生存，并去实现它。但是我的上天，如果需要，我也准备为这个理想献出生命。”

国内外自由人士（联合国大会几乎全体一致投票）强烈要求免被告人死刑，在这种巨大压力下，法官宣布一人无罪，判处其他人无期徒刑。

监狱里的教育

曼德拉镣铐加身，被押上一艘通往罗宾岛(Robben Island)监狱的渡轮时，他 44 岁，他获得释放时，将已是 71 岁的老人。

罗宾岛位于开普敦外海七英里，周围水域有很多鲨鱼，在数百年的历史中，那里曾是海军基地、精神病医院以及麻风病隔离区，但最出名的是监狱。对曼德拉和其他犯人来说，监狱之旅开始于令人作呕的渡轮上，看守们对着通风口往甲板下关犯人的船仓撒尿，以此寻开心。

罗宾岛上的日常生活包括关禁闭、厌倦无聊，以及对犯人的卑劣侮辱，也包括常常发生的抵抗。白天，犯人们被带到一个石灰石采石场劳动，采石尘粉堵塞了他们的泪腺。

但是在那个动荡的时代，监狱生活在某些方面反而不如外面的生活那样艰难。对曼德拉以及许多黑人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来说，罗宾岛是一座大学。他们在采石场的砸石声中悄声对



话，在牢房之间传递密密麻麻地写在纸条上的辩论，这些犯人们讨论的话题无所不及，从马克思主义到割包皮。

曼德拉学会了白人统治者使用的南非荷兰语(Afrikaans)，还督促其他狱友也来学。

他磨练了自己作为领导者、谈判者和劝导者的技能。不仅在犯人不同的派系当中，而且在一些白人狱官眼里，他的魅力和他铁一般的意志都不可抗拒。他说监狱经历教会了他当总统所需要的战术和战略。

几乎从刚到监狱的那一刻起，他就成了某种带头人。他的律师乔治·比佐斯(George Bizos)第一次去探监时，曼德拉跟他打完招呼后，出乎看守们的意料，他接着向比佐斯介绍了八名看守的名字，称他们是他的“仪仗队”。没过多久，监狱当局就开始把他当作监狱元老来对待。

他在罗宾岛坐牢期间，新一代的政治犯也被关到了那里，他们曾是全国学生起义中不屈服的抗争者。他们一开始时不服前辈政治犯的权威，但逐渐接受了前辈们的指导。曼德拉许多年后回忆起那些冲动的年轻人时还带着几分恼火：

“你问他们，‘你们要干什么？’他们说，‘我们要攻击和摧毁他们！’我说，‘好吧，你考虑了与他们、你的敌人的力量对比吗？’他们说，‘没有！我们攻击就是了！’”

也许因为曼德拉深受崇敬的原因，当局无缘无故地专门折磨他。狱守把新闻剪报塞进他的牢房，让他知道她妻子如何是一桩离婚案中所提及的第三者，以及他的妻子和孩子被内部流放到离约翰内斯堡 250 英里一个荒凉的黑人小城后，如何遭受苦难。

当局不许他出席他母亲和他长子的葬礼。后者在曼德拉坐牢期间死于车祸。

朋友们说，他的经历锤炼了他的自我控制，让他越发把感情埋得更深，说话时总是使用解放运动习惯的代词“我们”。

尽管如此，曼德拉说，他认为在自己的非种族视野的形成过程中，监狱经历是一个主要因素。他说，监狱让他接触到有同情心的白人看守，他们为他偷偷带来报纸和额外的给养；也让他接触到南非国民政府内的温和人士，他们主动来找曼德拉希望展开对话；这些都弱化了他任何报仇的愿望。最重要的是，监狱把他培养成了一位谈判大师。



谈判开始

与白人政府开始谈判的决定是曼德拉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他没有与他的同志们商量就一人作了主，因为他知道会遭到他们的反对。

他回忆说，“我的同志们没有象我那样与到这里来的政府要人、法官、司法部长、监狱总监接触过，我也是经过了一个过程才克服了对他们的偏见。所以我决定生米做成熟饭后再告诉我的同志们。”

曼德拉先是向司法部长科比·库切(Kobie Coetsee)示好，又拜会了波塔(P.W. Botha)总统，之后，他于 1986 年开始了持续多年的关于南非未来的谈判。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在接触中极少有怨恨，而是相互表示尊重。后来，当曼德拉成为总统后，他总是很高兴地向来访者显示波塔总统亲自给他倒茶的地方。

曼德拉要求政府释放沃尔特·西苏鲁以及其他瑞佛尼亚审判的被告人，作为政府良好意愿的展示。波塔的继任德克勒克总统照办了。

在他被囚的最后几个月，随着谈判越来越有起色，他被转到了开普敦外的维克托韦斯特监狱(Victor Verster Prison)，在那里，政府可以更方便地与他见面，并监视他的健康状况。（他在狱中做过前列腺手术，得过肺病，政府非常害怕如果他在囚禁期间逝世会带来的巨大反响。）他住在狱长的小楼里，那里有游泳池、花园、厨师和一台录像机。政府还专门为他定做了一套西服，好与政要们见面。

（获释后，他照着狱长房子的样子，在他的祖籍村庄附近修了一座度假砖屋。他解释说，这完全是出于实用的考虑：他习惯了那座房子的房间布局，晚上可以摸黑找到洗手间而不被绊倒。）曼德拉在非国大的盟友一得知这些谈判，他们马上的反应就是觉得可疑，他们的担心并未因政府允许他们在狱长的房子里与曼德拉见面而得到缓解。

曾经同被关在罗宾岛监狱的学生反叛者托基奥·塞克斯韦尔(Tokyo Sexwale)后来在“前线”节目的访谈中回忆了与曼德拉在那座舒适的房子里见面的情形。曼德拉带他们参观了房子，指给他们看电视机和微波炉。塞克斯韦尔说，“当时我想，‘我觉得你出卖了自己。’”

曼德拉请他的来客们在桌子边坐下，耐心地解释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敌人已经在道义上和政治上被击败了，他们除了军队一无所有，无法治理南非。他说，他的战略是给白人统



治者提供一切可能的机会，让他们有序地退出。他在准备与刚刚接替波塔的德克勒克总统见面。

获释重回剧变的世界

1990 年 2 月，曼德拉在妻子的陪同下走出监狱，回到了已变得陌生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对他则了解得更少。非国大内部产生了分裂，出现了几个派系：前政治犯，那些为劳工工会的合法工作度过多年抗争的人，以及那些在外国首都生活多年的流亡者。白人政府也分裂了，一些人致力于谈判产生一个真实的新秩序，另一些人则挑拨派系暴力，希望借此瘫痪黑人政治领导层。

接下来的四年里，曼德拉从事了艰苦的谈判，不仅与白人政府谈判，而且还要与自己的那些相互不和的盟友们谈判。

不过他首先在世界各地巡回访问了一圈，包括对美国八个城市的访问，访问从纽约开始，他乘坐的车队驶过时，受到狂热人群的欢迎。

反种族隔离运动与美国政府有着复杂的关系。美国透过与共产党冷战的视角看待南非，同时将该国视为一个重要的铀来源地。直到 1980 年代末，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其分析中仍将非国大视为共产党支配下的组织。有未经证实、但也未经排除的指控说，中央情报局特工为逮捕曼德拉的警察提供了线索。

国会 1986 年顺应民意，通过了限制在南非投资的经济制裁法，并推翻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对该法的否决。即使在美国民众热烈欢迎曼德拉的同时，有些官员仍对他怀有疑虑，一来因为他对经济制裁的坚持，再来因为他对各色解放人物如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el-Qaddafi)上校以及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推崇。

曼德拉在监狱受折磨期间，南非兴起了旨在使国家无法治理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它最积极的参与者不是别人，正是温妮·曼德拉。

磕磕绊绊的婚姻

丈夫被关进监狱时，曼德拉夫妇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但很少有时间享受家庭生活。在他们婚姻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是通过监狱探视间厚厚的玻璃隔墙见面。在他被关押的 21 年期间，他们从未触摸过对方。

然而，她是曼德拉对世界说话的一个喇叭，是他了解朋友和同志的信息的来源。她通过走访她的记者诠释他的观点。她受到了警察的折磨和关押，她和两个孩子被流放到一个荒凉偏僻的黑人小镇布兰特福德(Brantford)。在那里，她不放过任何一个挑战施害者的机会。

1984 年她被释放到风起云涌的索维托时，已经成为一个煽情的鼓动者。此时的她身穿咔叽布军装和高靴，言辞激烈，她因支持对敌人使用“火项链”(necklacing)酷刑而声名狼藉，“火项链”指的是把汽油浸泡的轮胎套在人身上，然后将其点燃。她身边围绕着一群年轻歹徒，他们恐吓、绑架和杀害那些她认为对事业持敌对态度的黑人。

朋友们说，把事业置于家庭之上的选择，常常令曼德拉充满自责，正因为如此，在人们早就广泛知道温妮·曼德拉进行恐怖统治，并涉嫌参与绑架和杀害小镇年轻活动人士后，而且在他们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后，曼德拉仍然拒绝对她作任何批评。

作为总统，他顺从温妮·曼德拉在大众中享有的知名度，任命她担任科技文化部副部长。她在那个职位上陷入多起财政丑闻，并且越来越多地挑战政府，经常指责其姑息白人。1995 年，曼德拉终于到法院申请离婚，在经历了一场揪心的公开听证后，于次年获准离婚。

之后，曼德拉与莫桑比克(Mozambique)前总统的遗孀、人道主义活动人士格拉萨·马谢尔(Graca Machel)在公众瞩目下恋爱。他们在曼德拉 80 岁生日时结婚。他身后的家人除格拉萨外，还有温妮·曼德拉的两个女儿岑娜妮(Zenani)和珍德兹斯瓦(Zindziswa)，第一个妻子生的女儿玛卡兹维(Makaziwe)，17 个孙子辈后代和 14 个曾孙辈后代。

多数人执政的政治交易

曼德拉获释两年后，黑人领导者与白人领导者在约翰内斯堡郊外的一个会议中心举行谈判。这些谈判导致了白人统治的结束，虽然过程并非完全顺利。谈判场外，南非的黑人极端分子和白人极端分子都使用了暴力，试图让谈判结果对自己一方更有利。曼德拉和白人总统德克勒克通过争论和策略，完成了一场和平的权力过渡。

德克勒克是一个高傲、不随和、烟不离手的实用主义者，曼德拉从来没能喜欢他，也不完全信任他，但在与德克勒克的关系中，他明白双方的共同需要。谈判进行了两年后，两人分享了诺贝尔和平奖，1993 年他们在奥斯陆共同出席领奖仪式，也未免被愤怒和揭短行为所玷污。曼德拉成为总统、德克勒克成为副总统一年后，曼德拉在一次谈话中说，他仍然



怀疑德克勒克与谋杀了无数黑人的警察和军队，也就是所谓的“第三势力”有串通，该流氓势力反对黑人统治。

最终，曼德拉和由前劳工领导人、深谙政治的西里尔·拉马弗萨(Cyril Ramaphosa)领导的谈判组与政府达成了一项重大的政治交易，保证了自由选举，同时交换条件，承诺了让反对党派分享一部分权力、并保证不会对白人进行报复。

接下来的总统竞选活动有时似乎有滑向全国大乱的危险。祖鲁人的派系之争导致数百人死亡，白人极端分子在竞选集会上引爆炸弹，并暗杀了受欢迎程度仅次于曼德拉的黑人领袖克里斯·哈尼(Chris Hani)。

但是，黑人城镇到处洋溢着的激动足以抵消恐惧。戴着助听器、穿着矫形袜的曼德拉竞选期间每天奔走 12 个小时，鼓舞着那些挤满了尘土飞扬的足球场的人群，令那些聚在楼顶上高唱解放歌曲的支持者欢呼雀。

1994 年 4 月选举期间，在有些地方，选民为投票排队长达数英里。非国大赢得了 62%的选票，赢得了议会全国大会 400 个席位中的 252 席，确保了作为党领导人的曼德拉在议会召开时被命名为总统。

曼德拉当年 5 月 10 日宣誓成为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中讲到共同的爱国主义，呼唤南非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同喜共庆，并为南非成为一个不再受国际社会谴责的国家而一起感到欣慰。

他宣布，“这片美丽的土地永远、永远、永远再不会经历人对人的压迫，以及遭全球唾弃的屈辱。”

之后，南非空军九架幻影战斗机拖着五彩喷气从空中飞过，在比勒陀利亚政府楼前的草坪上出席就职仪式的五万人群欢声雷动。“南非空军万岁！万岁！”（这些飞机原是买来防止象曼德拉这样的人取得政权的。）

作为总统的限制

作为总统，曼德拉立下了不拘一格、多种族和睦的风格。他大部分时候住在约翰内斯堡一座简朴的房子里，他每天自己整理床铺。来访的外国政要在他家做客时，他喜欢请他们与服侍茶水的女侍握手。

然而，他与富有的资本家、矿业大亨、零售商、发展商的关系也很随便，甚至粗心大意，他觉得这些人的继续投资对南非经济来说至关重要。选举前，他去找了 20 位企业家，请求



他们每个人至少捐一百万南非兰特（按当时的汇率相当于$275,000 美元），用于发展他的党，并作为竞选活动经费。任职期间，他一点都不避讳接他们的电话，后来当一些工会罢工反对他的一些大捐助者时，他很不高兴。他喜欢与极为有钱的人交往，喜欢与那些现在围在他身边向他致意的演艺界名人打交道。

与此同时，他坚持认为，黑人多数派不应该指望马上得到物质上的满足。他曾在某个场合告诉工会领导人要“勒紧裤带”，接受低薪，以便吸引投资。第二天接受采访时，他对自己无耐心盟友们表示惊讶，他说，“我们必须从抵抗运动状态过渡到建设状态。”

曼德拉展示了他大姿态和解的天才。不过，他的有些尝试，比如组织非国大知名女士与种族隔离时期白人官员的妻子们举行茶叙，则相当尴尬。

其它的尝试则非常成功。在南非，不管是那个种族，很少有人不记得 1995 年 6 月南非英式橄榄球队在世界杯决赛中击败新西兰夺冠的情景。2009 年拍的电影《永不言败》(Invictus)以戏剧形式记录了那个时刻。英式橄榄球长期以来一直是白人至上的一个象征，比赛结束后，曼德拉穿着球队的绿色球衣走进球场，八万名球迷，绝大多数为南非白人，爆发出“纳尔-逊！纳尔-逊！”的呼声。

曼德拉为了团结而进行妥协的直觉再清楚不过地显现在 1995 年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上。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在清算南非历史的过程中平衡正义与宽恕。委员会给任何对在种族隔离期间的罪行全盘作证的人提供个人赦免。

到头来，这个过程既没能获得完全的真相（白人官员和非国大领导人都闪烁其词），也没能达成彻底和解（许多黑人了解到更多情况后，越发愤怒了）。但总的来说还算成功，它给了那些亲人被埋于秘密坟墓的南非人一个明诉哀痛的机会，同时避免了无穷无尽审判的上演。

然而，不管曼德拉如何靠鼓动、象征主义，以及君王般的魅力来激发自己的选民们高尚善良的一面，他也难以弥合白人特权与黑人贫困之间的鸿沟。

曼德拉打造了让南非人获得自由这一奇迹，也许再期望他创造出广泛繁荣的奇迹，恐怕过求了。他任期期间制定的住房、教育与就业等目标本来就不高，但他只取得了不大的进展。

他尝试将警察从白人至上的统治工具转变为一支有效的打击犯罪的队伍，但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多数统治前就已存在的）腐败与任人唯亲更加猖獗。尽管曼德拉受到全世界的



景仰，外国投资却对南非保持了距离，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全球经济过热让新兴市场看起来比以前想象的更为危险之后。

种族隔阂被和平过渡的欣喜与曼德拉的道义权威一时控制住了，但后来随着缩小收入差距的最终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表现出来。

南非记者马克·葛维瑟(Mark Gevisser)在 2007 年发表的曼德拉继任者塔博·姆贝基总统的传记中写道，“曼德拉 1994 年至 1999 年总统任期内留给后人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是建立了一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法案保护的法治国家，而且人们早先预言的、南非的种族与民族暴力冲突没有发生。仅这些成就本身就保证了曼德拉的神圣地位。然而，他更多地是一个解放者和国家缔造者，而不是一个管理者。”

此外，曼德拉还给他的国家留下一个基本上是一党执政的体系，执政者对官员腐败的指控抱着官官相护的态度，不喜欢媒体的批评，把反对党派差不多当叛国者对待。不管是自由派的还是保守派的对手，都没有能够成功地组织起能有效抗衡非国大的反对派。

曼德拉本人总是遵从党的意愿，比如在继任总统人选上。在党的得意人选姆贝基继任总统后，曼德拉透露说他其实更喜欢比较年轻的拉马弗萨，即前矿工工会领导人、新宪法的谈判者。姆贝基知道自己不是意中人，因此心怀怨恨，在担任总统期间，经常对曼德拉有微词。

曼德拉大部分时候避免直接批评他的继任，但是当姆贝基表现出对批评不宽容以及他的阴谋论世界观时，曼德拉的失望溢于言表。当姆贝基质疑艾滋病病因的主流医学解释、压制有助于遏制传染病快速蔓延的公共讨论时，曼德拉公开发表言论，指出安全性行为与便宜药物的必要。当他的大儿子马克贾托(Makgatho)2005 年去世时，曼德拉把家庭成员召集到一起，公开透露他的死因是艾滋病。

在 2007 年的一次访谈中，曼德拉公开嘲讽姆贝基的领导能力，不过当时他要求这些话在他死前不发表。他说，非国大之所以是一个成功的运动和成功的政党，归因于它从许多不同的群体中汲取集体智慧。

“如今在姆贝基的领导下，非国大变得相当集权化，他自行决策很多事情”，曼德拉宣称，“我们从来都不喜欢那样。”

姆贝基则觉得，在曼德拉的阴影下治理国家是极大的痛苦。他感到他的前任留给了他一手几乎无法打的牌，首先曼德拉鼓励人们相信南非的解放是一位伟大黑人的魔术，其次他强调与白人当权者的和解，因此没做多少事去解救贫困的黑人多数人口。

在葛维瑟传记里的一次访谈中，姆贝基嘲笑曼德拉靠魅力和声望统治，说他很少留意治国的技术细节。

“马迪巴(Madiba)对政府事务一点都不关心，”姆贝基说道，“我们其他人则必须去关心，因为总得有人去关心。”（马迪巴是曼德拉的家族昵称。）作为一位前总统，曼德拉利用自己的魅力，支持非洲大陆的一系列事业，在几场战争中参与和谈，协助他的妻子格拉萨为儿童救助组织募捐。

2010 年，体育世界的另一桩和平盛事世界杯足球赛在南非举行，曼德拉为南非赢得主办权立下了巨大功劳。但对曼德拉本人来说，这个令人自豪的盛事带给了他心碎的哀伤，他 13 岁的孙女岑娜妮(Zenani)开幕日当天从庆祝音乐会回家的路上死于车祸。世界杯赛首次来到非洲，曼德拉功不可没，但他却取消了出席开幕式的计划。

那时他的听力与记忆力已十分糟糕，他已经基本上退出公众辩论，回绝几乎所有的访谈请求，在诸如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只发表预先准备好的公开声明。（他强烈反对伊拉克战争。）2007 年他接受一位记者的采访时，他的助手们已经就他的后事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包括他将被安葬在哪里，以及应该如何举办纪念活动等。曼德拉坚持把他的安葬事宜交给他的遗孀，而且尽量从简。但他的追随者却另有打算。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争】

张大军：专制统治术、心灵的自由与非暴力抗争（上）



张大军，民间学术机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理事。

“

毋庸置疑，所有的非暴力行动都会遇到暴力压制，所以，非暴力抗争的关键就是如何应付、战胜和超越暴力。

”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圣经·加拉太书》5 章 1 节。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谋攻篇》

（一）中国的专制统治术：以文攻与武卫为基础的心理战

1.经济拜物教与暴力拜物教的形成机制

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代起，对国家治理之术的讨论就获得了充分的展开。不过，不知何种原因，就笔者阅读所见，当代许多人对诸子百家的研究集中于思想和伦理层面，注重各个流派对后世思想和观念的影响，而对其实际的治理和统治术的研究相对比较少，甚至可以说非常少。笔者并非研究历史方面的行家里手，但通过有限的阅读和对当下中国现实的观察，笔者明显地感觉到，尽管当下的社会经济状况与 2000 多年前可谓有天壤之别，传统



的专制统治术却仍在当下的中国大地上大展身手，丝毫没有“过时”的迹象，反而借着现代的技术手段更上一层楼。

中国传统的“术”、“势”，“机”、“权”等具体的政治策略思维非常丰富驳杂，为了使问题的讨论更为简化，有必要对其进行提纲挈领式的总结。笔者发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一政治名言就高度浓缩了中国传统的专制统治术。它恰当地捕捉住国家治理中的精髓：软（祀）硬（戎）兼施，明（戎）暗（祀）配合；或者说是胡萝卜加大棒，引诱加威逼；或者说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总之，“祀与戎”为我们理解那隐秘的统治术提供了一把钥匙，一扇窗口。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的执政者的统治策略依旧没有脱离“教化”（祀）与“威压”（戎）双管齐下的旧模式。用现代的术语来说，“祀与戎”就是文攻与武卫的绝佳配搭。

“祀”就是祭祀，是宗教的仪礼和象征，也是意识形态的终极依托。CCP 号称唯物主义者，可谓名至实归，因为它们在现代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发展出新的宗教：拜物教，包括暴力的拜物教和经济的拜物教。之所以称其为拜物教，是因为它们分别崇拜枪炮和金钱这样的有形物质。正如暴力拜物教的经典教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揭示的那样，枪炮是执政者的“神器”。而又如经济拜物教的经典教义“发展是硬道理”所昭示的那样，发展是执政者的“天道”。这同时也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现代版。

毛泽东是暴力拜物教的教主。他对暴力的推崇是他在枪林弹雨的革命生涯中形成的一种思维惯性，并将其自然而然地带入他所统治的中国社会，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军事暴力统治机制。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大兵营。对于经历过百年动荡的国人来说，毛泽东的马上治天下之术不过是他们任凭命运摆布的一种无奈选择，是几千年来被暴力政权机器不停碾轧之后的逆来顺受。民众对统治当局和掌权者形成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感，而相互间的暴力对待也弥漫在整个社会。暴力因此而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和革命宗教的等价物。可以说，CCP 在建政前的革命时期消灭生命，既是对暴力拜物教的献祭，也是暴力拜物教的渊薮。建政后此起彼伏的各个运动--比如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被虐杀的几千万生命也先后都成为暴力拜物教的“祭品”。

同理，邓小平是经济拜物教的教主。现在的中国人之所以认同经济的拜物教，并非是枪杆子逼迫之下的选择，而毋宁是在极端物质匮乏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人性的自然反应。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确实是抓住了中国人的时代精神。尤其是在与国外物质丰富极大反差的情况下，物质刺激很容易成为主导人的精神结构的东西。吊诡的是，邓小平之能成为经济拜物教的教主，还要“感谢”暴力拜物教教主毛泽东，正是毛泽东的穷兵黩武造成的



绝对和普遍贫困的状况，才给经济拜物教的大行其道创造了前提条件。同样也可以说，CCP 在 1989 年风波中的动武，既是对经济拜物教的献祭，也是经济拜物教的深化。中国各地起伏不断的矿难中的矿工、富士康跳楼自杀的年轻生命、以及因拆迁而自杀或被杀的无辜民众都被持续不断地摆在经济拜物教的祭台上。

2. 拜物教的心理战效用

无论是暴力拜物教还是经济拜物教，作为拜物教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们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它们分别成为各自时代的精神主流，牢牢地捕获了民众的心灵，辖制了民众的理性，其所达致的意识形态效果是登峰造极的，为专制者的统治打下“坚实的民意基础。”另外，两者都分别以无辜的生命作为其献祭，并且民众的献祭不断地以这样和那样的名义和方式持续进行，鲜血淋漓的祭台让它们在仪式上获得了圆满的表达，使其教义不断得到强化。

凭着这样的拜物教，当局一直在开展“教化”的工作。所谓教化，就是文攻武卫中的文攻部分。质言之，文“攻”也就是心理战，具有“攻”击性，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像水银泻地一般，并“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圣经·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这种无所不在但又飘忽无影的心理战的效果非常大，一般民众受到这种心理战的影响，很容易陷入专制者的逻辑而不自觉，最终都变成专制的合作者和顺从者。

譬如，我们常常能听到一些民众说：中央的政策（也即经济拜物教下的发展导向的政策）是好的，只是下面的官员在执行时出了问题。这句话翻译成拜物教的用语就是：上层的教义是好的，下面的祭司没有按照教义的要求去做。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推知，当局的“教化”非常成功，真正地做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当局通过“教化”的手段不断向民众灌输其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的教义如何伟大，并借着反腐败和一些媒体的报道，成功地将某些替罪羊地方官员塑造为叛教者。地方官员的所作所为，有时不但没有损害中央教义的权威，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映衬出中央教义的“伟大”。这样的宣传逻辑从根本上维护了教义和体制本身的合法性，是当局心理战的一种有效手段，使得部分民众“甘心情愿”地臣服在其教义之下，并接受其统治。几千年来，中国的各个专制王朝一直在塑造“圣王”和“清官”的神话，其目的显然也是通过心理战达到让民众自动和主动臣服的目的，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统治境界。这样的神话被转换为当下的经济拜物教神话，从而使得当局的心理战以变换了的形式延续下来，甚至与时俱进地有了创新。



不过，经济拜物教作为政教合一政权的官方意识形态，其软肋恰恰就在于该政权金字塔式的教阶组织难免会像天主教会那样腐化。在天主教会掌握有很多世俗的物质财富时，其教士团体因为经受不住物质的诱惑而堕落腐化了。CCP 作为一种彻底唯物的宗教团体，其对物质的追求被认为是正当的，因此其贪婪腐化就比掌握大量物质财富的天主教会更加迅疾猛烈得多。于是，正如天主教会因腐化而导致其失去信徒的认可一样，经济拜物教团体的贪婪腐化则导致其信众的纷纷质疑。在这样的背景下，正如新教改革挑战了天主教会的权威一样，部分民众也开始抗争，挑战和反抗经济拜物教的官方权威。

与此同时，经济拜物教的物质决定意识的教义就决定了基于虚幻“教化”的心理战不可能有长久的果效。经济拜物教许诺给人的不是“彼岸”的超越完美，而是“此岸”的物质丰富。这就注定了受其影响的民众是不看广告看疗效的，也因此，以虚幻的“全民富裕”为号召的经济拜物教就总有穿帮的一天。一旦“全民富裕”的海市蜃楼被贫富分化的现实所击碎时，经济拜物教的教义就面临着破产的危险。

于是，不仅经济拜物教的教阶组织（各级党委和政府）面临着挑战，而且经济拜物教（发展是硬道理）本身也遭到质疑。由此而引发的各种各样的维权和抗争事件以及行动起来的公民个人和群体就对拜物教以及教阶组织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这时，文攻武卫中的“武卫”那一部分就启动了。本来，与具有进攻性的文攻不同，武卫是防御性的。如果没有发生重大的事端，武装力量不会轻易出动，因为“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尉缭子·兵令）。不过，当发生群体性事件时，警察、特警、武警乃至正规军队都会被派上用场，以武力压制民众的诉求，成为当局的最后一道防线。“武卫”的特性在此得到鲜明的展现。

不过，武装力量的防卫性并不仅仅表现在它时常被用于镇压民众的反抗上，作为暴力拜物教的“护法”，它起到的是更为强大的心理作用。它的存在本身就常常成为令民众恐惧和退缩的理由，因为即便是备而不用的武装力量，如果辅之以暴力镇压的口号与宣传，无疑能起到很大的威吓的心理效果。这种威吓的最高境界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用出动武装力量，民众就自觉地退缩了、屈从了、顺服了；换句话说，就是民众从心理上彻底服输了，当然民众也就不会反抗了。不难设想，武力的威吓作用实际上远远大于其实际的阻遏作用。一旦民众对武力的恐惧心理消失了，武力的威胁效用就会大大减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局绝无可能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施展武力手段的。即便它对无数的民众使用暴力，其暴力机器的能力也是无法胜任的，因为民众的数量远远超过其暴力所能压服的。这就是说，暴力从终极的意义上讲，也是因震慑人心而起到维护政权之功效的。



概而言之，暴力机器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上的，维系暴力机器的存在以及对它的讴歌、赞美和支持都是一种心理战术。暴力的“武卫”职能和教化的“文攻”职能就是这样在广义的心理战战场上携手并肩为专制统治服务的。“文攻”与“武卫”的心理战分工明确：一进取一保守，一软一硬，一攻心一攻身，一形上一形下。简言之，文攻的心理机制是：制造欲望->激起向往之情，而武卫的心理机制则是：制造恐惧->逼出屈从之心。凭借着这种珠联璧合的“文武之道”，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将心理战的功效发挥到了极致，中国的民众就是这样不战而屈地成为专制统治的顺民的。中国的专制体制衍化出超级稳定的结构，中国的社会表现出超级停滞的特征。这其中，专制统治者高妙的心理战术居功至伟！

3.发展与维稳--经济拜物教的黄昏与暴力拜物教的复兴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执政党的经济拜物教教化在无情的现实面前碰壁就等于其文攻战术的失败，为了维系其统治，自然而然地，执政党就会转向防守，这时作为心理战战术另一翼的武卫机制就正式出场了。所以，我们看到，执政党现在的主导口号就变成：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相比于“发展是硬道理”这一经济拜物教的核心教义，现在的执政者的提法有非常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提法的背后一方面是对经济拜物教的修正，另一方面更是对暴力拜物教的回归。这标志着执政者统治方略的显着转变。

众所周知，暴力拜物教是毛泽东所创立并被执政党所保持和维系的历史遗产。正是毛泽东时代的暴虐统治让对暴力的恐惧感深入人心，这种恐惧感是如此地强烈，以至于直到现在它还会有很大的心理威慑作用。不过，由于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拜物教的相对成功，暴力拜物教被当局有意无意地遮蔽或者掩饰住了。但毛泽东作为创立者的现政权有着无以伦比的暴力色彩，因此，暴力拜物教并没有消失，只是在经济拜物教的强光下显得有点黯淡而已。一旦统治者发现经济拜物教对维持其政权有点力不从心时，暴力拜物教就从政治舞台的隐蔽处重新走到了镁光灯下。

如果以本文前述的逻辑来表述，发展是第一要务与维稳是第一责任的并列就是文攻兼武卫的生动表达。当全民齐唱“发展是硬道理”的赞歌时，没有人会想到当局还隐藏着“维稳”这一另外的“硬道理”。当作为武卫手段的“维稳”被迫走上前台，成为执政党的基本方针时，这就说明本来以暴力为隐蔽后盾的政权已开始“裸奔”了。这种暴力统治策略从隐形向显性的转换，恰恰说明当局的统治术已经山穷水尽了。换句话说，当局的心理战已从柔性的诱惑走向硬性的威胁了，由于当局已经做不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于是就开始“亮剑”了。



《老子·三十六章》有云：“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维稳说白了就是将“国之利器示人”，这样，执政者就会象“鱼脱于渊”一样很快干渴而死。所以笔者断言，这种对民众的穷兵黩武是当局统治日薄西山的不妙征兆。从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到当下执政者的“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的转化，就意味着当局的治国策略其实是从汉朝退回到秦朝了。

这种退化既是暴力拜物教及其教主毛泽东阴魂不散的历史惯性使然，也是执政党统治危机加深和治理失败的典型体现。不过，由于执政党的治理尚能维持表面的和谐，所以其现在的统治策略似乎是发展与维稳并重。而且在说辞上也是“发展是第一要务”排在“维稳是第一责任”的前面，好像经济拜物教仍要优先于暴力拜物教，也即邓小平的风头依旧超越于毛泽东。笔者担心的是，随着执政者治理难题的加剧和治理效能的衰减，这种邓小平高于毛泽东的并列关系将逐渐发生变异。

由于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当局的维稳责任也将越来越重。在此过程中，由于地方和中央各个利益集团做大，中央核心的管制能力相对下降，当局治理能力也将逐渐衰减。更重要的是，已经高度透支的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将在此后的若干年内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衰竭的迹象，高速的经济发展将难以为继。这些因素的重叠将造成严重的后果。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无法再继续提供“收买人心”的功能，经济拜物教将渐渐式微，甚至彻底破产。另一方面，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暴力化解决方式将日益显着，当局将越来越多地运用暴力来维系现有的统治秩序和利益格局，暴力拜物教将显出越来越大的“威力”。于是，几乎没有悬念的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当局对暴力拜物教的操纵将甚于对经济拜物教的鼓吹。当局的统治策略则会变成：维稳是第一要务，发展是第一责任。虽然维稳和发展虽仍是并列关系，但维稳却已经压倒了发展，成为当局的首要职责。这时的毛泽东已占了邓小平的上风。也许，我们现在已处于这样的转变过程之中。

本来，发展的经济拜物教与维稳的暴力拜物教的双重教义和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双重教主的构造已经显示出执政党“党格与党性”的分裂，以及由此带来的执政党内部的紧张关系。当执政党在其夺取政权六十周年大庆上重新大张旗鼓地祭出其暴力拜物教教主时，其“党格”分裂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双重教主的格局必然会影响当局心理战的果效。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士和中小企业主纷纷移民，而且盛世下的中国居然有数不清的“裸官”。这无疑就是当局“党格和党性”分裂所造成的心理战失效的显着表征，因为中产阶



级和企业家们的“退出中国”就是对当局的不合作，而官员家属们的“逃离”则是用脚对它们的不信任投票。

当然，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不难设想，一旦经济发展出现大的波折，经济拜物教完全不再能够提供当局所希望的那种“怀柔”作用，暴力（而不仅仅再是暴力的拜物教）将不得不在蜂拥而起的各种挑战面前独自承担起为执政党“护驾”的功能。如果局面到了这种光景，当局很可能喊起“维稳是硬道理”的口号，将经济发展的硬道理边缘化或者悬置。届时，毛泽东将嘲笑邓小平：你还是逃不出我如来佛掌心啊。不过，毛泽东也可能高兴得太早了，因为古人讲：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秦二世二亡，就是这个道理。

在现实和可能的未来中国图景中，暴力拜物教乃至暴力本身将继续复兴，经济拜物教则将继续衰微。对于现在的统治者来说不妙的是，少了“祀与戎”中的祀这一翼，其专制统治肯定无法持久。因为“祀与戎”的排序显然不是随意为之的，而是蕴藏着深刻的道理的：“祀”一定要在先，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优先性必须保证，而“戎”虽然看似更有实际的力量，但必须放在第二位，也即次要的地位。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相比于以暴力压制所形成的民众的屈从，以“教化”说服形成的民众的顺从的成本要低很多。换句话说就是，以暴力压制维系统治的成本太高了，并且高到治理无法延续的地步，更不要说达不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心理战最高境界了。

毛泽东暴力拜物教的信徒们，你们要当心了！

（二）心灵困境中的暴力陷阱与对暴力的超越

1.中国式极权统治的心灵后果和暴力陷阱

“祀与戎”互相配合协助的专制统治术让中国早早就成为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极权国家。极权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统治者凭借其所掌握、主张和推广的意识形态的说服力而取得合法性和正当性。当然，意识形态主张后面还要有隐而未显的暴力的支持。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祀与戎”恰恰成了现代极权主义的古代中国对应物，而且“祀”的优先性刚好对应了现代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优先性。古代中国统治特征与极权主义如此的吻合绝非是一种巧合，而是显示出极权主义在中国的源远流长，在西方则反倒只是晚近时代的产物而已。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要从中国和西方历史的不同说起。诸如阿伦特之类的西方思想家在论述现代极权主义时，其所参照的历史坐标都是西方的。而在西方的历史上，由于罗马帝



国崩溃后所形成的四分五裂的政治格局以及基督教会力量的强大和独立，世俗政权从来都没有形成对精神的垄断权。也就是说，国之大事中并不包括“祀”，因为后者被牢牢地掌握在独立的教会手中（先是天主教会，后来则包括各个宗派的新教教会）。尽管各种力量试图将欧洲再度统一起来，而天主教会也试图让教会的权威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但这两股力量终究都没有成功。结果是，西方在 20 世纪才出现既是帝国元首又是纳粹主义之导师的希特勒。

中国的情形则与此不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话所隐含的就是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政治首脑自古以来既是帝王又是天子，既是君主还是大祭司，政治首领始终控制着“祭祀”的权力，从而就垄断了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自秦始皇一统中国之后，继起的汉代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权力覆盖了全中国的统治者又顺理成章地成了精神上的权威，将“祀与戎”统统揽在自己的麾下。自此以后，中国就成为了统一的政教合一的古代极权国家。之所以说它是古代的，是因为它尚未掌握现代的技术手段，但实际的内涵则与现代极权主义没有根本的不同。因此，说极权主义发端于中国，并不为过。

正如上面已经分析过的那样，极权主义的功效是，通过“祀与戎”的并用，它既收买、迷乱、煽惑人心，又控制、压抑、捆绑人心。总之，它刚柔并济，就是不让心灵得自由和释放。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王朝更迭无算，但人的心灵并没有多大的改变，王朝更迭所改变的只是政权，而非体制，更非人心。而且王朝更迭的原因并非其意识形态的失效，而只是由于其治理效能的流失和衰败。易言之，中国的各个王朝之所以被推翻，并不是因为这个政体有多糟糕，多不堪，而是王朝本身无法从技术上有效地统治下去。在王朝的起落更替中，民众的心思意念依然被牢牢地定格在统治者所预定与延续的轨道中。民众被锁定、塑造和固化的心灵没有变得强大，也没有更新和转换。于是，他们的生活世界就这样被专制统治术永远地抛入受愚弄和奴役的状态之中。

由此可见，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灵催眠术和心理战成了心灵自由的天敌，各种现代版与古代版的“祀与戎”交相并用的心理战捕获和牢笼了普通民众的心灵。

总而言之，“祀与戎”相结合的专制统治造成了我们精神的贫乏，陷我们于心灵的困境之中。而精神的困境又让中国人无力逃不脱专制的魔咒。于是，专制统治就在中国循环不息，生生不已了。

吊诡的是，中国王朝统治技术上的屡次失败并没有从根本上让人们对王朝专制政体本身的道义和精神基础做出深刻的反省。这是笔者在阅读和思考中国历史时常常感到困惑的一个



大问题。本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相反，与专制王朝循环相对应的是暴力反抗与暴力夺权的循环。专制和暴力循环内在的一以贯之的线索是民众心灵的封闭和精神的贫乏。在这样的贫乏中，中国人怎么会有健全和深刻的反思能力呢？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统治术中的意识形态功夫真是太到家，太成功了，以至于它所形成的天罗地网已让民众无处逃遁，不战而屈人之兵到这样的地步，谁能说中华智慧不高深奇妙呢？

当某一王朝专制统治因其治理的无能和低效让人忍无可忍时，某些雄心勃勃的草莽、武夫或者外族武装集团就会觉得有机可乘。他们要么揭竿而起，要么武力篡权，要么凭借军事力量入主中原，从“戎”这一方面下手，以“戎”制“戎”。显而易见，“戎”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改朝换代的契机，而“祀”则依旧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暴力能解决的也只有“戎”的问题，却无力解决“祀”的问题。以暴力夺权的政权不仅无法超越“祀”的辖制，而且还会延续“祀”的生命。以暴易暴式的对抗既无法完成也代替不了以心灵自由摆脱心灵专制的使命。正所谓，暴力反抗易，心灵自由难。于是，绵延不绝的“祀”就成了中国人命运的魔咒，让中国的历史陷入停滞之中。“戎”的武力却走不出“祀”的圈套，以柔克刚的中国力学原理是暴力反抗所不得不面对的残酷历史真相，这也是暴力反抗的最大难题。

可悲的是，问题还不仅仅如此。贫瘠的心灵反过来又孕育出残酷的暴力传统：“春秋无义战”与“吊民伐罪”就是这种传统所生出的一对怪异的双胞胎。作为乱世之中争权夺利之场景的历史总结，“春秋无义战”透露出来的是一种赤裸裸的丛林状态，为中国以后的各色暴力冲突奠定了争权夺利的现实底色。不难理解，极权主义的政权不会讲什么“义”字，所有的战争和暴力冲突是而且仅仅只是它们争夺利益的手段而已。中国极权主义思维下的战争观讲的是整体的“势”、辨证的“机”、人际的“和”与实用的“理”。简言之，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作为极权政治之延续的战争当然就缺乏对正义性的追问，也难怪，历朝历代无数民众的肉身在不计其数、只问结果不问是非的暴力冲突中灰飞烟灭了，都被极权统治者摆上了他们的祭坛。因此，如果极权统治者不是总是在鼓励暴力的话，那他们至少是一直在纵容暴力。

另外，汤武革命式的吊民伐罪为暴力叛乱和暴力夺权所提供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也不容小觑。顺乎天、应乎人式的吊民伐罪基于一种子虚乌有的天命观和五行终始学说。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学说几乎总是各种试图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事业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式的正当性让暴力涂抹上一层神圣的光彩，而这样的理直气壮却也正映照出中国人深层的精神困境：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似乎只能是以暴制暴，暴



力是中国人的宿命！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吊民伐罪的思维却也体现出中国式极权主义的韧性。吊民伐罪的罪也就是罪在一人的罪。汤武革命的对象也仅仅是暴君一人而已，罪与体制无关，更与意识形态无关，而只与暴君这个坏人一个人有关。体制是好的，意识形态是好的，只要把这个坏人换上一个好人问题就解决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吊民伐罪的巧妙与罪己诏的奥妙如出一辙，因为后者也成功地将体制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转换为皇帝一人的道德或人品问题。笔者儿时在文艺作品中时常看到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所隐含的逻辑也不过如此。换言之，罪在一人的吊民伐罪可能不是要取消极权体制，而是要“更好地”延续极权体制。

2.过“红”海：走出心灵的死海

上面已经提到，一直困扰着中国人的暴力陷阱与中国人的心灵无法挣脱网罗有关，心灵的死海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肉身的死海。CCP 夺权和掌权的整个历程就为笔者的这一断言做了生动的阐释。CCP 夺权时诉诸的不是心灵的力量，而是暴力的力量。这正是中国式极权统治在 CCP 掌权后得以变相延续的源动力。

有必要指出的是，CCP 以暴力夺取天下，而且为其暴力行动披上颇为迷惑人的外衣。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的宿命论与中国人天命循环的宿命论就是它的两件“迷彩服”。不难看出，这两件“迷彩服”是内在地契合的，前者催生了暴力革命，后者则一直为各路王侯、造反者和军事集团暴力夺权提供合法性。两者具有精神内涵上的高度一致性，当代极权主义与古代极权主义的亲和关系于此分明可见。这样的“迷彩服”具有高度的欺骗性和排他性，以鲜血筑成了封闭中国人精神和心灵世界的万里长城。

而且，成功夺权的领导人们依靠现代的治理手段让中国式极权体制更上一层楼，并有所更新和创造，演绎出经济拜物教和暴力拜物教的古怪组合。质言之，CCP 的拜物教既不是一种理性的东西，也没有实在的精神内容，而且它既淹没了理性，也遮蔽了心灵。从某种意义上讲，维持 CCP 地位的不是一种理性的算计，而是一种非理性的信念或者说拜物教精神。同样，由于当下国人的精神被拜物教所俘获，心灵控制术也未能被一般民众所看透。因此，拜物教只能是一种巫术式宗教。

一方面，这种巫术式宗教对暴力的推崇和依赖让中国人事实上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中。对暴力的推崇集中地体现在其所选用的各个象征物上。比如，红色国旗就象征着其权力是靠暴力流血换来的。在每一个所谓的国庆假日里，各处鲜艳招摇的五星红旗无疑在向人们暗示，红彤彤的血色之光是暴力拜物教的荣耀，这种荣耀如此之大，足以将“青



天白日”遮蔽。暴力话语与隐喻的盛行与肆无忌惮是中国人精神贫血的生动写照，也让现时的中国成为暴力的渊薮。因为每一面五星红旗确实都凝聚了中国人的鲜血，也都是心灵的刽子手和精神的埋葬地，中国人能不精神贫血么？五星红旗下的中国成了充满红色暴力的死亡之海。

从现实生活的层面来看，由于专制政权本身具有浓重的暴力色彩，专横恣意的暴力机器到处耀武扬威，而且暴力对抗时时发生在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身边，中国人普遍发展出两种极端对立的暴力情绪。首先，人们对暴力（尤其是“合法的”国家暴力）有很深的恐惧感，害怕被暴力伤害的不安全感深埋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其次，在这样的暴力氛围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暴力作为解决纷争的方法，暴力相向成了人们意气之争和利益之争的常用手段。中国人的心灵在压抑与暴虐之间摇摆。结果就是人心的扭曲、沉沦和死亡。

另一方面，这种巫术式宗教对财富的追慕和渴求让中国变成一个彻底唯物主义的王国。先是将先富起来的“万元户”塑造成新的时代英雄，接着又以 GDP 作为衡量各级官僚业绩的主要标准，然后又以改革的名义大肆掠夺民众的财富。财富站上了统治的制高点，且以此藐视并摧毁掉人间一切美好的情感、良善的意志与纯正的精神。经济拜物教的物欲蒙住了人的心眼，造成了人心的荒废和蒙昧，即便富裕起来的人也不能摆脱精神黑暗与无知的状态。

很不幸，经济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变成一种新的拜物教，将全人类经过艰辛探索所形成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乃至个人精神生活全部取消。中国的经济拜物教乘上经济全球化的东风，好像如虎添翼，以势不可挡之态折磨和泯灭人的精神自主权。在这物欲的狂潮中，中国执政党所控制的红色经济体中又成功地培育出全球化的时代宠儿：红色资本家和红顶商人。

红色暴力再度复兴，红色经济大行其道，红顶商人如日中天，这些都是五星红旗下的中国尚被困于“红海”的明确无误的标志。如何过“红海”，是考验每一个中国人心灵的大问题。

要正确地解答这一问题，人们必须拥有自由的心灵。否则，答案总也逃不出暴力鲜血的红色魔爪。心灵的自由是人们走出精神的困境并突破当局心理战的重重迷雾的前提条件。人的精神和心灵的自由使人能够摆脱成建制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当人人皆祭司之时，国家的祭祀功能将不复存在，执政掌权者也就无法从心灵和精神上控制民众。这样，国之大事在



祀与戎的统治逻辑的前半部分就彻底失效了，专制者的“文攻”将缺少了有力的凭借。更重要的是，因自由而苏醒的心灵还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在经历这样的苦难”，并“谨守警醒，”以“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那“吼叫的狮子。”如此一来。执政者非但无法实施有效的“文攻”了，而且其“软实力”还会遭到顽强的抵抗和反击，并终至名誉扫地。

那么，心灵自由的可能何在？心灵的自由是纯全的信仰的必然结果。笔者不了解别的宗教的教义，但基督教的新教神学认为，基督在新约中“已赋予良心以自由。”基督信仰的历史已经为我们证明，这一神学立场确实带来了个人良心的自由与心灵的释放。由于良心自由和精神解放能够击中中国专制统治心理战的软肋，当局拒绝信仰和良心自由就有了紧迫而真实的战略性原因。不过，良心自由的历史显示它完全能够战胜独裁者们的拦阻而成为人类精神事务的普遍法则，即便在中国也可能如此。良心自由的观念最初于 16 世纪发端于英格兰剑桥清教徒的小圈子之中，后来却成为美国宪法所保障的最重要的基本权利，再后来被《世界人权宣言》确认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准则之一。现在，它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可和实践。也许我们可以说，良心自由的扩展史本身也就是个人自由的扩展史。

考虑到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境况，无论如何强调心灵自由的重要性都不为过。自由的心灵会对人的命运发出终极的追问，并探寻人的永恒价值和尊严，所以说，自由必然将人的心灵引向永恒和超越之境。以保障人的永恒尊严和超越性权利（而非具体的利益）为旨归的宪政体制于此肇始。中国式极权统治所依赖的天命理论和五行终始说却是有着时间刻度的，因此，受到专制者摆弄的中国人的心灵总是被局限在短暂的和具体的世界之中。中国人缺乏对永恒的期盼和超越的向往与他们对“时”（短暂的）“机”（具体的）的孜孜以求是一体之两面。

在中国被迫进入现代世界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中国的政治经历了多次剧烈的变动，于今仍余波激荡。我们考察这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人物的行为模式就可以发现，他们既是在“时间”里寻找和创造“机会”，同时也在“时间”里被“机会”裹挟和利用。这里面的深刻道理就在于，中国变革的动因基本上是由暂时的具体问题推动的，无关超越性和永恒性，所以中国的变革最终也就无法指向永恒性和超越性--人的权利和价值。前赴后继的独裁者们总是在盼望“我的机会”，他们希望的是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他们自己的心灵也是不自由的，当然想象不出具有超越性和永恒性的天赋人权，更何谈保护超越而永恒的人权呢。所以，中国的政治就像中国人迷茫的心灵一样在过去一百多年中总是变来变去，随着各个独裁者对时机的偏好和追逐而摇摆。与此同时，由于没有对永恒的和平之君的期

盼，为了争取实际的利益，大大小小的独裁者们就祭起吊民伐罪的暂时性招牌，理直气壮地使用起暴力。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有理由对我们的时代感到欣慰，因为我们可以预见到，追求永恒与超越的心灵自由不仅将帮助中国人过红海，还将成为中国人永久的祝福，并带他们进入那迦南美地。

3.正义之师缺失下的现实选择

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二战题材的美国经典电视连续剧《兄弟连》中开头的一句平淡的台词却有着惊心动魄的效果。在驶往欧洲战场的美国运兵船上，一位美国士兵问该剧中的主人公温特（Winters）：“你是贵格派信徒么？”温特默而不语。对于一般的中国观众来说，这一对话可能太平常了，但对于比较了解基督信仰的人来说，这句台词却涵义实在太丰富了。贵格派作为新教的一个支派，是持绝对的和平主义立场的，在美国殖民地时期，贵格派信徒甚至要求将拒绝服兵役当作他们的一项良心的权利。他们视暴力为对他们良心的一种亵渎，可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即使连贵格派都可能要穿上军装，拿起武器与纳粹的暴力机器抗衡。温特的默不做声确实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尽管温特后来否认他是贵格派信徒，但这句台词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战争暴力不可避免的残酷真相。

同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上帝仆人的德国牧师朋霍费尔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计划，因此而被捕入狱，并在德国投降前几个月被杀死在监狱里。在二战后对战争的反思中，朋霍费尔的神学在美国受到广泛的关注，其为了阻遏暴力机器的运作而试图暗杀暴力机器操纵者的努力得到普遍的认同。朋霍费尔知道，杀人本身是为上帝所不喜悦的且是会受到上帝惩罚的（众所周知的十诫中有一条就是：不可杀人），但为了挽救更多人的生命，他愿意承担在上帝面前受罚的代价。正是出于对同胞的爱，他甘心情愿地接受上帝的处罚。于是，他成为为了阻遏希特勒的罪行而甘愿在上帝面前接受惩罚的另一个意义上的殉道者。

笔者相信，无论是《兄弟连》中温特的原型人物（他肯定是反对一般意义上的暴力的，所以他的战友才误认他为贵格派信徒），还是朋霍费尔牧师，在决定参战或预谋暗杀的前后，他们的心灵肯定都会有翻江倒海的变化。促使他们最终毅然决然地诉诸暴力手段的不是仇恨，而是出于对同胞的爱。同时，他们的举动反映出人类的这一深刻悖论：在追求和平时，人们有时不得不诉诸于暴力，在极端情况下，暴力甚至成为和平的必要之恶。同



理，对于邓玉娇来说，邓贵大就是她的毛泽东和希特勒。她的暴力行动也是为了维护她的尊严和权利的一种必要之恶。

从更一般的视野来看，我们必须承认一种关于正义战争或正义武力之观念的合理性，这种战争或暴力的目的是而且仅仅是维持正义而已。正义战争或正义武力理念的前提是，人类有时会有极端恶劣的非正义的暴行。无论是从工具效用论还是绝对价值论的角度来论证，以战争或者武力来终止这样的非正义暴行都是合理的、正义的。比如，北约以轰炸南联盟的方式来阻遏米洛舍维奇政权的种族屠杀暴行，就是当代世界中正义战争或武力的鲜活例证。再比如，美国的南北战争基本上是因为北方人从宗教伦理上无法忍受南方的奴隶制引起的，美国北方人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正义之战，其目的也是要以暴力终结非常不人道的奴隶制度。正如朋霍费尔和温特的暴力是为了阻止恶人继续作恶和消灭暴政，北约轰炸南联盟和美国北方人的内战也是为了阻止恶行的继续和蔓延。换句话说，这些暴力行动之所以被视为是正义的，并不在于暴力本身，而在于暴力在严格限定条件下的真实目的。

从终极的意义上讲，正义之战的理念也许永远都不会过时，因为人类作恶的倾向是无法彻底根除的。只要人类根深蒂固的罪性存在，正义武力或战争就有其存在的必要和理由。尽管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暴力不可轻言放弃，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暴力之正义性是有非常苛刻的前提条件的，它必须在严格限定的环境和情况下运用。这就牵涉到如何拷问战争或暴力的正义性问题了。在笔者看来，如果没有自由的心灵，就不可能有对正义的追问，当然也无从思考暴力的正义性问题，最终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正义之战。只有自由的心灵，才会对暴力的正义之维发问。自由的心灵必然会得出的结论是：暴力不是为了复仇，不是为了争权夺利，不是为了个人的野心，而是为了爱与公义。这就是正义战争或者武力的真谛所在。

相反，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了个人性的正当防卫之外，对暴力的运用（尤其是集体性的运用）几乎从来是不讲正义的，有的只是个人或集团野心包装下的吊民伐罪（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是替天行道），或者春秋无义战式的混战，或者所谓侠士的快意恩仇，或者武林好汉的滥杀无辜。这是中国不断地陷入苦难的深渊的重要原因之一。CCP为夺取政权而施行的暴力是上述几种暴力的综合体：既有吊民伐罪的外衣，又行着消灭生命的动作，还与国民党陷入争权夺利的混战之中。其施用暴力的目的仅仅在于夺权，而非消灭暴政，一旦其暴力取得胜利，它就会让暴政以一种更为隐秘也更为张狂的方式延续下来。



我们甚至可以说，CCP 在夺取政权后与民众一直处于准内战的状态。只不过，由于所有的政府表面上都拥有“合法”的暴力，中国的这种暴政下的准内战状态似乎是隐而不显了。当维稳成为重要国策时，执政党这时事实上是在对人民发动一场低烈度的暴力战争。也因此，中国的政权就越来越有了军国体制的特色。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的每个极权专制王朝在后期都多多少少会陷入一种准内战状态，皇权专制政体就开始带有明显的军国体制的色彩。中国现在正处于从党国体制向党军国体制演变的过程之中，这既是维稳国策的自然延伸，也是中国最不幸的发展前景。在王朝末期的准内战时期，诸如练饷或剿饷之类的维稳费用就会多起来，这和当下维稳经费的迅速增长如出一辙。向军国体制的演进，似乎是中国各个极权专制王朝的必然宿命。笔者在第一部分已经预言，政权的维稳暴力将愈加极端，民众将因此更加困苦。

如何因应这种日益严酷的准内战体制以最终赢得人的自由和尊严？这是摆在每个有责任感的中国公民面前的沉重问题。从理论上来讲，自由的心灵并不完全排除诉诸武力的可能。因此，如果中国有一支真正的正义之师，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就是发动一场正义战争。以正义的武力压过非正义的暴力，让民众获得自由，不啻为一种不太坏的选择。但现实是，我们没有一支这样的追求公义与爱的正义之师。正如上文已经分析过的那样，这样的正义之师在中国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眼下也毫无踪影。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

在这样的现实中，非暴力抗争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毋庸置疑，所有的非暴力行动都会遇到暴力压制，所以，非暴力抗争的关键就是如何应付、战胜和超越暴力。下一部分将要分析的就是，自由的心灵如何可能以非暴力抗争为手段超越并战胜暴力压制。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玛丽·伊莉莎白·金：如何像马丁路德金一样学习非暴力抗争

“

他的一位朋友，回忆这位年轻的神学院学生通过测算基础为甘地的策略辩论——如果是通过暴力策略，而非原则，那么任何小众群体将寡不敌众。

”

要如何学习非暴力抗争？像马丁·路德·金一样——通过学习、阅读和审问经验丰富的导师。金可能是第一位最忠实地推进和普及甘地思想的美国人，他通过说服美国黑人把印度对抗英国帝国主义的策略运用到黑人抗争中。然而，他不是第一位从印度次大陆把这个知识带到美国的人。

三十和四十年代期间，许多著名黑人领袖通过远洋航行和螺旋桨飞机前往印度。大学校长、教授、牧师和记者漂洋过海至印度同甘地见面，并学习如何展开大规模的非暴力抗争。这些人回到美国后，撰写文章、布道和讲学，并同其他黑人领袖经手传播关键文件作学习阅读。历史学家苏达杉·卡普尔（Sudarshan Kapur）展示了甘地思想如何在那个时代积极地从印度流传到美国，同时地，美国黑人媒体也报道了印度独立抗争。黑人社区的领袖鼓吹属于美国的 “黑人甘地” 言论 。有位女性把它唤为 “培养一位先知”，后来被卡普尔选用为他的书名。

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的切斯特（Chester）市的克罗泽神学院（Crozer Theological Seminary ）就读时，金被罗梭和甘地思想吸引，然而当时他尚未对甘地思想作深入研究。他的一位朋友，J.皮乌斯·巴伯 （J. Pius Barbour），回忆这位年轻的神学院学生通过测算基础为甘地的策略辩论——如果是通过暴力策略，而非原则，那么任何小众群体将寡不敌众。



金越深入研读甘地事迹后，他对基于“爱”的有效性哲学愈加不怀疑，而“爱的力量” 又是他当时修习基督教牧师神职专攻的中心思想。“当我更深入探索甘地哲学，” 他后来写道，“我对爱的力量所持有的怀疑也逐步地消除，同时地我第一次认识到它在社会改革上的力量。” 1954 年 4 月在成为德克斯特大街浸信会教堂的牧师后不久，在他开始组织蒙哥马利运动时，他严谨地思考甘地运动根本上的诉求方式。

1955 年 12 月 1 号，当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在公共巴士上因拒绝让位给白人男子乔安·罗宾逊（JoAnn Robinson）——一位工作至深夜，组织群众性经济不合作运动的妇女政治委员会（Women’s Political Council）的领袖而被逮捕。金一致被推选为蒙哥马利改进联盟（ Montgomery Improvement Association）领袖，持续抵制市区公车。

紧随着蒙哥马利抵制的启动，一些活动家、和平主义者、改革者、激进的基督徒和社会主义者接踵而至。受到金的鼓舞，他们认为金可以把正义斗争提升到一个自废除奴隶制以来，还未在美国发生的，更为庞大的新秩序中。他们中的一位是比金年长 17 岁，年届 44 岁，隶属反战者联盟（War Resisters League ）的贝亚德·拉斯廷（Bayard Rustin），他之后继续帮助金，把蒙哥马利抵制发展成一个成熟的运动。反战者联盟让拉斯廷全职帮助金这项任务。

在蒙哥马利的黑人社区，同其南方地区一样，也武装起来；有人担心，它可能转向暴力斗争。拉斯廷担心金本人可能没有深厚根基而动摇。夜晚，他一个劲地督促金阅读书籍；拉斯廷担帮助金分析甘地思想，同时也成为第一位系统性地教导金关于非暴力抗争要领的导师。

抵制运动获得成功——1956 年 11 月 13 日被最高法院裁判，地方法律在巴士上逼迫隔离有违宪法——这一胜利为南方地方废除其它相同歧视性做法燃起了希望。美国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能够基于甘地非暴力策略的一部份原因是因为阿拉巴马城黑人社区的合作无间。“虽然蒙哥马利抵制仍持续进行着”，金说，“印度的甘地是指引我们在社会变革中就非暴力抗争策略的明灯。”

在 1957 年 2 月，金在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会见了一位来自循道会，名为詹姆斯 M.劳森（James M. Lawson, Jr. Lawson）的黑人牧师，小劳森曾因为在朝鲜战争期间拒绝征兵合作而被关押在联邦监狱中达 13 个月。关押期间，循道会的理事会成功地向法院申诉，将劳森移交给他们。循道会之后派遣劳森到印度纳普尔的希斯洛普（Hislop）学院教学。劳森在甘地去世后四年抵达印度并在那里教学叁年。他也会晤了多位曾同甘地一起工作过的



人，并向这些参与者学习了甘地运动第一手经验。金对劳森的背景和经验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彼此都仅 28 岁。他请求劳森不要等到学习完成后才到南方：“现在就过来！我们迫切需要您。我们没有像您这样的人。” 正如我曾在别处记载的，劳森成为了搭建从印度传送知识到方兴未艾的美国民权运动和当代抗争中的人类桥梁。

劳森在 1957 年同金会面后，他联系了当时仍在和睦团契（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掌舵的 A. J. 穆斯特（A. J. Muste）；穆斯特是位著名的基督教和平主义者。穆斯特聘请劳森任职和睦团契的南方户外干事。在 1958 年 1 月，劳森定居纳什维尔（Nashville）。抵达后劳森认识了金的另一位导师，格伦·斯迈利（ Glenn Smiley）牧师；斯迈利同时是和睦团契全国户外主席，他安排劳森指导一个全程研习班——包括该年初第一个在哥伦比亚，南卡罗来纳州的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SCLC)）的年度会议。在那里，金热烈地介绍劳森。“尽快在下午两点回来，” 金宣布，“出席劳森兄的非暴力研习班！” 在预定时间到来之前，金本人坐在教堂里的第一排长椅上，专注地等待叁小时课程开始。劳森有次在同我的一次访谈中提起：

“马丁在世时，在每回的年度会议时都会这样做。他会请求我指导下午的研习班，通常是二至三个小时，而且他会把它安排成大型的研习班，如此一来在没有其它可比较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会出席。他自己把研习班时间记录下来，还以身作则早到几分钟，独自坐在前排。”

劳森和马丁路德金合影在纳什维尔，整个 1959 年的秋天，劳森领导每周一晚上的会议，与有兴趣的学生分析他在印度期间学得的理论和实践。他的研习班审阅圣经，还有甘地、马丁路德金及罗梭的著作。他们练习测试案例，包括小型的静坐。劳森的研习班为期数月一直到 1960 年 2 月 1 日，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博罗的静坐示威消息传开为止。听闻到格林斯博罗抗争后，75 位纳什维尔的学生如法炮制，展开了（1960 年）更大型的，更为有纪律和影响力的静坐示威运动。与学生一起工作时——劳森总是平和与谦虚持重——纳什维尔的学生不仅是在金的一位导师下接受培训，同时地也直接受益于甘地的实验。静坐给于了总体运动区域性的影响力，而纳什维尔的学生也成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基石；我是当中的一位学生。

在纪念金博士的生日时，最值得纪念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像金一样学习非暴力抗争。金虽然没有发明他推进的非暴力策略，但他是位聪颖的学生，而且他对非暴力的认识将能在未来数十年鼓励世界舞台上其它运动。他成为历史上其中一位最有影响力，在传播知识方面



为具有潜在建设性的社会改革上未付诸暴力的代言人。金本身如何学得公民抗争的理论和实践提醒我们每个人，这些方法既不出于自觉性也非自发性；而是必须学习的，有系统的逻辑、技巧和技术。

（本文译者 zhp9888，来自译言网站：http://select.yeeyan.org/view/341562/309588）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辨】

黄卧云：回到曼德拉：非暴力主义的真伪



“

我们这个被暴力和暴力革命反复蹂躏的国家所形成的历史记忆，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非暴力主义的理解，对非暴力的简单肯定和否定、以及对暴力的简单肯定和否定都同时存在着。

”

黄卧云，媒体工作者。

曼德拉是世界非暴力主义运动的丰碑，也是非暴力主义的伟大诠释者，国人对他的关注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热度，对他的崇敬丝毫不减。而今非暴力主义已经成为普世价值。

对我们来说，非暴力主义完全是一种外来之物，这一思想也容易引起误解。我们这个被暴力和暴力革命反复蹂躏的国家所形成的历史记忆，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非暴力主义的理解，对非暴力的简单肯定和否定、以及对暴力的简单肯定和否定都同时存在着。一些知识精英不但把非暴力变成一个表面的概念，而且把它变成一种伪劣的崇高，他们总是想象自己站在道德的高地上，把底层民众想象成天生没有理性和一味宣泄仇恨的群体，并给他们贴上暴民的标签。虽然我们有“和为贵”的思想源泉，但它与非暴力主义没有共同点，它没有包含爱也没有包含反抗的思想。

探求非暴力主义的源流，回到曼德拉，是我们加深理解非暴力主义的重要途径。非暴力只是非暴力主义的一个重要维度，但也许不是最重要的维度。非暴力主义是一种爱的哲学，又是一种反抗的哲学，还是一种行动的哲学。我们只有从非暴力主义的动态实践中才能准确地把握它。非暴力主义在现代的三个伟大实践者--甘地、马丁·路得·金和曼德拉，对非暴力主义的理解和实践也不完全相同。对甘地而言，非暴力主义是一种必须始终坚持、

不可违背的原则，但曼德拉只把它当作一个可以灵活运用的战略战术，而最近，中东民众用行动为非暴力主义做出了最新解释，其民众的防卫性暴力进入到非暴力的实践中。

爱与受难

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在圣经中有一段最广为人知的表述：“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你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根据基督的观点，惩治邪恶的正确方法是绝对不抵抗。当遇到邪恶的侵犯时，不是用暴力去抵制它，只要不加抵抗，邪恶就会无计可施，而抵抗只会产生更大的邪恶。基督对邪恶从不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而是宁愿受苦，让罪恶都完全展现出来。十字架就证明了只有爱和自愿受难才是战胜邪恶的唯一力量。战胜仇敌不是靠仇恨，而是靠爱--爱自己的仇敌。爱自己的仇敌，而不仅仅是爱自己的兄弟和邻居，才是真正的爱，基督徒的爱。仇敌是指那些仇恨自己的人，而不是自己所仇恨的人。敌人的仇恨越深，他就越需要爱。

祝福仇敌一如祝福自己的兄弟，爱自己的仇敌一如爱自己的兄弟，那么，邪恶势力是不是就因此而停止迫害了呢？基督并没有做出这样的应许。忍受的意义不在于让邪恶减轻和终止迫害，减轻和终止自己的痛苦。对耶稣来说，忍受十字架的痛苦并不是悲剧，受苦是上帝给基督的安排。跟随基督也就要跟随基督受苦，一心一意地顺从耶稣，是对信仰的献身。对于邪恶，忍受和顺从就是对抗。

无论是从一般的意义上，还是从终极的意义上，爱比恨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爱的包容力最终会消融仇恨。仇恨会扭曲自我，爱却会使自己纯洁。爱仇敌是一种伟大的理想。相对于暴力，爱体现反抗的博大和理想境界。相对于仇恨，爱体现了至高无上的力量。仇恨和暴力可能导致对手的毁灭，但也导致自我的毁灭。可是，我们又如何理解生活的现实常常显示出来的东西？忍受和软弱常常招致侵害？

在面对邪恶者迫在眉睫的暴力侵犯和凌辱时，仅仅只有爱，显然很难是令人满意的最好的自我保护措施。所以，耶稣承认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上帝真正的律法，这种律法“不是要被废除，而是一笔一画都要成全”。报复的正义是人类追求正义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没有对罪犯的公正审判和量刑，无辜者就不能受到可信的保护。法律必须给报应留下重要的一席之地，给以暴制暴留有一席之地。一个社会如果好人得不到好报、坏人得不到恶报，

都不会是一个正常社会，就更别提理想社会了。二战后对逃匿的纳粹战犯几十年不懈地全球追捕，表明了人类社会对有罪必究、邪恶必须受到制裁的理念的决然坚持。

但报复显然不是征服邪恶的理想方式，毋宁说它是一种虽然是必须的、但又是有缺陷的方式。因为它缺少爱的力量，缺少对社会进行修补、使之不断完善的努力。在基督教中，撒旦的黑暗王国和上帝的统治对抗始终存在。在黑暗王国里，受苦是如何征服邪恶势力的呢？上帝的善最终要战胜恶，仅仅靠这样的信念来维持还是不够的。现实讲求效果，理想需要完美，通过现实与理想的适当折中、调和，效果与理想的统一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可以设想，通过受苦者的逆来顺受，邪恶不断自我暴露，因为受苦和忍让会刺激邪恶进一步发展。中世纪的罗马教会就再现了这一过程。其时，它的权势正处于炙手可热的鼎盛时期，它不但没有实践爱仇敌的美德，没有早期教会的牺牲精神，相反，它变得高高在上，毫不宽容，并建立了宗教裁判所对异端进行残酷迫害。它把上帝赐予的权柄变成无休止敛财的工具。这样它也使自己陷入邪恶和腐败的深渊，它的暴行和贪婪揭露了它自己的邪恶。罗马教会的邪恶充分表演和暴露，使它遭到的反对力量越来越大，最终成全了路德的改革。

路德宗教改革以飓风般的速度取得了胜利，分裂了罗马教会。路德的胜利与其说是由于路德的力量，不如说是因为罗马教会的腐烂和败坏。

从甘地、金到曼德拉

非暴力抵抗从宗教信念变为世俗信念，从基督跟随者的个人行为变为争取解放的群众运动，从主要是抵抗邪恶之人变为主要是抵抗制度之恶，真正使非暴力从抵抗的哲学变为抵抗的行动，起点是印度的甘地。

在英国完成学业的甘地，其非暴力信念相当重要的部分来自基督教，但他注入了自己的思想和策略，他赋予非暴力主义以明确的现实感，变成争取胜利的有效手段。

甘地伟大之处，既是道义上的，也是方法上的，他把“耶稣人与人之间的爱的伦理提升至有效的大规模社会力量”（马丁·路德·金语），他找到了不通过暴力革命成功摆脱暴政、结束以暴易暴的可靠途径。在甘地看来，以暴力反抗压迫不可能产生正义的结果，非暴力反抗才是实现真理的唯一方法。但非暴力不是简单的非暴力，演说、请愿、呼吁等简单的非暴力无助于压迫者改变他们的态度，放弃他们的行为。甘地十分肯定地指出，“我不相信呼吁会有用。”因此，非暴力必须是一种积极的和直接的行动，是勇敢地面对暴



力。他所采取的积极行动就是公开违反法律，然后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被逮捕、监禁、遭受人身伤害。他相信抵抗者从容承受苦难，会开启压迫者被蒙蔽的双眼。

甘地必须找到一条道路，使非暴力主义真正成为解放的福音。解放如果依靠神意的无敌力量、依靠屈服和顺从就能实现是难以想象的。基督徒的屈服和受苦很难成为有效的政治反抗形式。政治反抗不是服从，而只能是不服从。甘地把非暴力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发动群众集体参与到反抗运动中来，是他进行斗争的重要形式。对集体的恶，需要集体的对抗，单个的、个体的反抗不能表现出足够的力量。他发动了手纺车运动，发动了向海滨进军的造盐运动，动员印度人民不买英国的布匹，不买英国的食盐。甘地始终坚持，他的反抗必须是绝对的和平方式，他最后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自己非暴力主义的信仰和原则。

甘地的非暴力革命是克制的，比起放纵感情的革命，它没有刺激的语言，没有狂热的煽动。前一种革命者是为了理想而自己承受苦难，后一种革命者是为了理想而让别人承受苦难，把千千万万的他人送上革命的祭坛。

在那个时代，非暴力反抗在本质上就是违法行为，不违法和无所事事就无所谓非暴力反抗。呼吁改革的一派在提醒社会公众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由于他们惧怕担当风险和道德上的怯懦，其中的一部分会成为阻碍改革的力量。非暴力不能成为没有勇气反抗的漂亮借口，懦弱从来不会是获胜的方法。非暴力运动始终要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就是统治者不会轻易放弃暴力镇压和特权。在强大的压迫面前，人们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完全没有脾气，等待压迫者良心发现，赐予自己权利，要么是组织比统治者更加强大的暴力。对于饱受压迫的人们来说，后一种做法一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不会成为多数人的选择。多数人将被迫地自动地选择前者。

非暴力反抗是两极之间的中间道路，它拥有激励和动员民众的巨大能力，但它又不是把民众投入战争的血海之中。非暴力反抗同样需要献身精神，虽然甘地哲学的绝对信奉者从未超过一百人，然而就是靠这一小批献身的信徒激励整个印度挑战英帝国的强权，并赢得了自由。

非暴力反抗运动必须有违法行为发生。从美国宪法把公民的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确立为基本人权后，非暴力反抗政府已经是合法行为--人类历史的一次跨越式发展。因此，人们一般地不把这种合法的非暴力抗议视作为非暴力反抗。但是美国黑人，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并没有享受与美国白人一样的公民权利，种族歧视的强大势力维护着白人的特权，于是美国黑人争取宪法权利的斗争就成为非法，这样才有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



领导的非暴力反抗运动。金发现，一些特权个人可能放弃不公正的地位，但特权集团很少能够放弃其特权，它比个人更倾向于不道德。他决定不能再像他的黑人祖先和同辈黑人那样“等下去”，而是行动起来，发动罢乘运动，组织“向华盛顿进军”，在社会中制造紧张和危机，以迫使当局和美国人面对黑人的问题。他明确地将非暴力当作一种战术，这是与甘地的不同之处，但他也像甘地一样，以自己的受苦来唤起更多的人投身到争取黑人权利的斗争中，包括“白人兄弟”。他曾五次入狱，两次遭受暗杀，第一次差点丧命，第二次未能幸免于难，那年他 39 岁。

一味靠自我牺牲所产生的道德力量和它对压迫者的感化能力引起人们的怀疑。为什么压迫者不承受压迫的代价？在美国黑人权利运动内部，金的非暴力主张受到正当防卫主张的挑战。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非暴力斗争后并没有阻止政府的暴力，这对它的非暴力主义构成了严重考验。它决定重新思考自己的战略。曼德拉这时是党的领导人之一，坚决主张走有组织的军事斗争的道路，并获得了组建军事组织的授权。但他和他的游击队--民族长矛军--没有走上游击战争的道路，而是选择破坏这样一种低烈度的暴力形式，对发电厂、电话线、交通枢纽发动突然袭击，但严禁造成人员伤亡。这是比非法集会和游行更加严重的违法行为，既最大程度地制造社会紧张，又避免在白人与黑人之间埋下血海深仇。

在随后 27 年漫长的牢狱生活中，曼德拉认识到暴力不是解决南非问题的最终办法。他仇恨白人的种族专制制度，但他不能仇恨白人，他认识到，自由不仅是解放被压迫者，也是解放压迫者。出狱后，他与南非白人总统德克勒克一道，坚定地运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种族主义问题。在同政府的谈判中，曼德拉坚决否定白人统治的改良形式，他坚持，对于一种压迫制度，不能只是改良，而是必须全部抛弃。他坚持南非必须是一个不分种族、一人一票选举中央议会制国家，把非暴力主义手段的灵活性和目标的坚定性完美地结合起来。

1994 年，南非结束了长达 350 年的白人独裁统治，南非的白人和黑人终于走到了一起。这一刻，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来得太不容易。从它 1912 年成立起，已历时 82 年之久。曼德拉给自己的自传取名《漫漫自由路》，恰当地表达了他追求自由倍感艰难曲折的体验。在自由的征途上，勇气、坚韧、决心与爱同样不可缺少，爱需要勇气，行动更需要勇气，需要不断克服自己的畏惧。他说，勇敢“并不是不畏惧，而是战胜了畏惧。我记不清自己有多少次感到畏惧，但是我把这种畏惧藏在了勇敢的面具后面”。暴力和仇恨也会有正义的动机，也会以正义的名义行使，但它们最终会走向正义的反面，只有爱才能维系正义。

从权力的角度看，暴力和仇恨更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爱的真理在攫取权力的道路上可能没有优势，有时甚至是一种劣势，但对于达成正义和自由的目标，它绝对是一条捷径。在一个国家，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一部分人不自由，就不会有所有人的自由，用爱消融仇恨，是实现所有人自由的条件。金告诫他的黑人同胞，美国黑人的命运是与“白人兄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报复与工具

非暴力抵抗在 20 世纪成为民众争取自由和权利的基本方式，在争取一些较小的和临时性的利益目标上，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市民要求保护自己的城市环境，非暴力抗争方式被广泛使用。缅甸的昂纳素季是目前仍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推动非暴力斗争的榜样。

由于政府暴力十分强大，民众使用非暴力反抗成为实践的必然，而不是一种选择，也就是说，除了非暴力反抗别无他途。曼德拉说：“我很清楚，军事胜利即使有可能，也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曼德拉更看到了统治者的致命软肋：“他们虽然拥有各种轰炸机和坦克，但是他们一定感觉到自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2011 年的中东展示了非暴力主义的新发展和新形式，这些新特点更加接近曼德拉的非暴力主义，即作为工具的非暴力主义，而对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作为绝对原则的非暴力主义--则有所偏离。这种新变化不是来自于深思熟虑的理论，而是来自于现实条件的变化。在被互联网改变了的现实中，非暴力反抗运动变得不同于以往。首先，我们看到传统非暴力主义的受难英雄不见了，互联网不但把思想和主张极为广泛地传播到大众当中，而且成为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的有效途径，非暴力主义者过去通过受难英雄的道德力量唤起民众和组织民众的方式不再成为必要。

其次我们发现，在那些国家，短时间内就能迅速掀起一场全国性反抗运动，旧秩序很快瓦解。能够很快地动员大规模的群众力量投入到对抗性行动中，弥补了非暴力运动原先力量上的不足，实现了和平与力量的结合。

第三，民众的非暴力反抗在遭到政府的暴力镇压后，以暴制暴的反抗就开始登场。在甘地的非暴力主义那里，刀剑之于反抗不但完全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他认为一个人只要还想保留他的剑，他就尚未到达完全的无畏。但是利比亚和叙利亚人民争取自由的决心使他们拿起武器同压迫者开战。大量的人员伤亡是这个国家的不幸，但它避免了在更长时期内流更多的血，这又是利比亚人民的幸运。



非暴力主义脱离了领袖人物和核心团队的领导后所呈现出来的上述特征，必然要引起人们的深刻注意。在甘地和金的非暴力主义哲学中，通过自己承受苦难达到目的，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其力量在于以英雄忍受痛苦的能力对抗统治者施加痛苦的能力，鼓舞广大民众投身于反对压迫者的行动中。实践这一学说需要高度的自觉、极大的勇气、自我牺牲精神以及长期忍受迫害，它只可能适用于那些具有非凡意志和坚定信念的人，而且这只会是一些为数很少的个体。

无论是在甘地还是在曼德拉时代，对于普通大众，他们的目标是追求世俗意义上的平凡的幸福，为信仰献身不会是多数人的意识。在一场广泛动员起来的反抗压迫的非暴力行动中，当非暴力手段引起了卡扎菲式的镇压时，他们就会寻求其他的手段或者工具，报复的意识就会抬头。

而在曼德拉那里，人民行使正当防卫权对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将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从而保护和平。一边是有严密组织的暴力，一边是要求恢复社会正义的民众，前者虽然随时可以发动暴力打击，但在可以预料将遭到正义力量的反击情况下，对风险的估计就会使它谨慎从事。它使用暴力的风险越大，和平的可能性就越大。

非暴力主义与非暴力有着多个方面的联系和区别。从甘地、金到曼德拉，非暴力主义作为工具的目标是促进改革，最终以民主原则改变暴力政治。为了促进变革，非暴力主义追求和平的但也富有效率的行动方式，离开手段的有效性谈论工具和非暴力是没有意义的。凡是没有行动能力的非暴力，没有战斗性的非暴力，不但与非暴力主义无关，而且为非暴力主义所反对。

任何工具，任何论断，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和悖论，非暴力主义也不例外。局限和悖论并不是荒唐和谬误，事物是矛盾的统一，它的一端是真理，相反的另一端还是真理，一端有局限性，另一端还是有局限性，因此需要用辩证的方法使对立面结合到一起，承认对立面包含的真理，承认自身的局限，尽可能避免执于一端，否则我们只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不能阻止南亚次大陆的宗教仇恨和暴力冲突，估计也不能阻止卡扎菲的杀戮，报复作为一种矫正的手段无法放弃。当然，报复的局限性比非暴力主义更加明显，它所能达到的目的更为有限。报复引起反报复，就将进入一场无休止的暴力冲突中，因此严格限制报复的范围，特别是由法律实施报复，就是非常重要的：既满足了报复的正义，又防止了暴力扩大的危险和暴力循循相因的悲剧。



集体实施防卫性暴力是对暴力的报复，具有惩处的性质，把它的报复性惩处限制在仅仅针对首犯的范围内，对避免出现暴力失控的局面是成功的。在当今世界的一些初生民主国家，各种势力学会和平相处尤为重要。相比于以压迫和镇压为主要手段的专制制度，民主制度显然能够更有效缓解冲突。民主在废除种族隔离政策之后的南非顺利扎根，毫无疑问是由于曼德拉的和解政策--非暴力主义的另一层面。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史蒂文•吉隆：60 年代，美国“自由之夏”运动

“

第二天早晨，‘自由之夏’运动的老成员担心发生了最坏的事情——施沃纳、钱尼和古德曼成了该运动的第一批殉难者，令人悲哀的是，摩西的策略正在起作用。

”

1964 年，美国南方 500 万达到选举年龄的黑人中只有 200 万人登记投票。近一个世纪前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 15 条已保证了投票权，但华盛顿却让各州自行决定投票的资格。在南方，各州制订了复杂但有效的措施，剥夺黑人的投票权。七个州设置了文化考试，如果黑人在投票登记表上拼错了一个字，注册处可以拒绝发给他们选票。五个州征收了“人头税”，这就有效地剥夺了贫穷黑人和白人的选举权。阿拉巴马州要求黑人在白人公民的陪同下去投票地点，白人将为黑人的品德作“担保”。当法律不能阻止黑人投票时，白人经常诉诸暴力或经济恫吓。

密西西比州在设计种种剥夺黑人权利的方法方面显得尤为“聪明”。1955 年，州议会取消了允许黑人在当地选区登记的分散登记做法，黑人往往必需长途跋涉，到县法院去登记。那些在 1955 年以前登记过的少数黑人也不得不根据新规则而“重新注册”。州里制订了更难的“理解测试”来代替文化考试，“理解测试”往往要求黑人申请者回答与州里一些模糊不清的规定有关的问题。密西西比州两美元的人头税，在南方也是最高的。

争取关注的唯一途径

1964 年，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在只有 5%的黑人登记投票的密西西比州组织了一场争取投票权的运动，这一运动是原哈佛大学哲学系学生罗伯特·摩西的心血结晶。

南方的大多数民权组织都将总部设在了亚特兰大，然后派遣志愿者到各个城市地区活动。摩西意识到许多最贫穷的黑人居住在农村地区，需要在那里组织民权运动，所以他在密西



西比州的麦库姆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在联合组织委员会(COFO)这一伞式组织之下，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SNCC)与种族平等大会(CORE)和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协同发起了争取投票权运动。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一再遭到殴打和谋杀，他们争取黑人投票权的努力在吸引白宫或是美国媒体的关注方面同样成效甚微。在两年时间里，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在密西西比州的黑人投票登记名单上只增加了 4000 人。

陷入僵局后，摩西建议邀请北方出身名门的白人学生参加他们的斗争。他分析说，如果这些白人学生也遭受到与黑人同样的残酷对待的话，整个国家就会予以关注。他告诉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这些学生将把整个国家一起带过来，他们来自名校，而他们的家长都是有影响的，整个国家的兴趣将被激发，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政府就会对这一问题做出反应。”

安德鲁·古德曼是个典型的参加“自由之夏”运动的申请者，像近 900 名其他申请者一样，他是一个兼备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白人学生。他家境优裕，足以放弃夏天打工赚钱的机会。高中毕业后，像这个国家中的许多人一样，他看到了要求平等分享美国梦的黑人遭到消防水龙袭击和警棍殴打的景象。怀着当时年轻人的理想主义，他对母亲说：“这太可怕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号称是民主的国家，但他们却不能投票。”

安德鲁于 6 月 13 日夜很晚才抵达校园，像其他志愿者一样，他拍了报名照，并填写了表格。培训班包括许多小型集会，志愿者在会上了解自己分配到的工作细节，而在全体大会上，他们则学习当受到攻击时如何保护身体的要害部位，以及如何建立与当地黑人社区的关系。一位民权律师为志愿者们提供了一些实用的建议，他说：“如果你开车在路上被警察叫停，并被逮捕，即便你没有犯下任何罪行，也要进去坐牢。密西西比州不是给警察上宪法课的地方，许多警察甚至没有读完小学五年级。”在一次集会上，一位持同情态度、从罗伯特·肯尼迪的司法部来的名叫约翰·多尔的代表，向他们通报了联邦制的范围。他说：“联邦没有警察部队，负保护责任的是地方警察，我们只能进行调查。”演讲结束后，很多学生抱怨联邦政府放弃了其提供保护的责任，回到各自的房间后，有的人还私下里哭了起来。

未知的前方等着什么

在培训班担任领导的人中，有一些来自密西西比州、被称为“丛林战士”的老资格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的第一线工作人员，安德鲁很快就与其中的两位建立起了友谊。24 岁的迈克尔·施沃纳是一个来自曼哈顿下城的社会工作者，他和他的妻子丽塔曾积极参与了



北方的民权运动，参加过在巴尔的摩和纽约举行的抗议游行。1964 年 1 月，他们把公寓转租出去，然后长途跋涉，从布鲁克林来到了密西西比州。由于迈克尔的背景和受过的训练，摩西交给他的任务是在梅里迪恩建立一个社区中心，在那里教黑人阅读并登记投票。在梅里迪恩工作时，施沃纳夫妇很快就和当地一名 21 岁的黑人詹姆斯·钱尼成了朋友，他跟着他俩也来到了俄亥俄州参加培训。

在俄亥俄州的培训班上，施沃纳与古德曼在一起度过了一些时间，他邀请安德鲁与他一起到梅里迪恩共事，最初安德鲁没有答应，他说他已承诺在密西西比州的坎顿做另一项工作，然而就在他临行之前几天，三 K 党党徒持枪袭击了一位上了年纪的教士，烧毁了密西西比州尼肖巴县的锡安山卫理公会教堂。几个星期前，施沃纳和钱尼曾访问过这座教堂，这个全体信徒都是黑人的教会邀请他们去那里建立一个社区中心。烧毁教堂显然是一种报复行为，这是三 K 党惯用的一种伎俩，仅在 1964 年，密西西比州就有 20 座黑人教堂被火焰炸弹烧毁。认识到梅里迪恩更需要他的服务后，古德曼改变了他的计划，他将与施沃纳和钱尼一起返回密西西比。

6 月 20 日，古德曼、钱尼和施沃纳，还有另外四个人一起乘上一辆蓝色的客货两用车，开始了驶往密西西比州梅里迪恩的 16 小时的车程，为了避免进入密西西比州后在黑夜中行驶，他们于凌晨 3 点半就出发了。

施沃纳、古德曼和钱尼在星期六深夜抵达梅里迪恩，只睡了几个小时，就在第二天一早动身，去察看烧坏的锡安山教堂。临行前，施沃纳对办公室里的志愿者们解释，每个前往尼肖巴县的人，必须采取什么样的防范措施。“这里有一条永远不变的规则：‘下午 4 点以后，谁也不可留在尼肖巴(县)’。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到下午 4 点我们还不回来，你们就应该向在杰克逊的(联合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发出警报，并开始察看从梅里迪恩到尼肖巴之间的每一座城市监狱、县监狱、警长办公室、警察局和医院。”

证词无法描述的恐怖

6 月 21 日是父亲节，三个人驱车 45 分钟前往梅里迪恩，在下午一、两点时到了欧内斯特·柯克兰的家。柯克兰是当地的一名支持者，他同意帮助他们寻找可能的目击证人，和他们一起乘车到了烧毁的教堂。他们从一些目击者那里收集了证词，随后在下午晚些时候回到了柯克兰家中，柯克兰太太给了钱尼一块自制的巧克力蛋糕，大约 30 分钟后，施沃纳说：“现在我们得回梅里迪恩了。”

在开车回梅里迪恩的路上，他们被费城的副治安官塞西尔·普赖斯以“超速驾驶”为由拦了下来。普赖斯立刻认出了有着一撮山羊胡子的施沃纳，因为他是被列在三 K 党的死亡名单上的。普赖斯没有给他们开罚单，而是把他们带到了当地的监狱，对他们说，要由治安法官伦纳德·沃伦设定超速罚款金额，必须把他们关起来，直到找到这位法官为止。普赖斯利用这段时间与尼肖巴县三 K 党的头目埃德加·雷·基伦取得了联系。基伦的公开身份是一名牧师，普赖斯把三个人滞留在监狱里足够长的时间，让基伦能在“长角牛咖啡馆”里组织起一帮三 K 党武装人员。这帮武装人员中有个身材魁梧的前陆战队队员韦恩·罗伯茨，因打架和酗酒而被开除出了军队，几个月来他一直叫嚷着要杀掉施沃纳。

大约晚上 10 点，普赖斯告诉三个人他们可以走了，他们需要做的就是交付 20 美元现金的保释金。大约在 10 点 30 分后，三个年轻人离开了费城，他们以为终于脱离了危险。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基本上来自联邦调查局线人干巴巴的证词。

获释后，他们又在一场时速高达 100 英里的追逐中被副治安官普赖斯和两车武装的三 K 党党徒重新捕获，三 K 党党徒们伏击了他们的汽车，然后把三个人带到了巨石路旁一个僻静的地方。韦恩·罗伯茨对施沃纳说：“你就是那个热爱黑鬼的家伙吗?”施沃纳回答说：“先生，我完全知道你的感受。”施沃纳刚说完这句话，罗伯茨就一枪打中了他的心脏。接下来，罗伯茨又以执行枪决的方式，用一颗 0.38 口径的子弹射穿了古德曼的脑袋。三 K 党党徒詹姆斯·乔丹大声喊道：“给我留下一个!”说着就冲到钱尼面前，朝着他的肚子开了一枪，然后，罗伯茨又朝着钱尼的背部和头部开了几枪。

三具尸体被扔进客货两用车，沿着土路驶到费城西南大约六英里的一个农场，当地的一个商人正在挖一个池塘。建池塘的第一步是挖一条宽 30 英尺，深 5 至 6 英尺，长至 100 英尺以上的沟，然后在上面建一个土坝。沟里填满捣实的红粘土，红粘土会变硬，可以防止水的渗出。一旦粘土基础完工，就把泥土堆积在上面，直到达到所需的高度。谋杀发生的那天晚上，红粘土基础已经捣实完工，但上面还没有堆土，三具尸体被脸朝下扔进沟里，并排躺着。一名凶手用推土机推来约两英尺厚的泥土掩埋了尸体，以后的几周里在上面又加了更多的泥土。

为了迷惑调查人员，凶手们将烧毁的客货两用车遗弃在费城东北 15 英里外的博格奇托沼泽边，迫使当局开始搜寻时先要挖掘沼泽。他们的希望是，在当局浪费了几个星期在河流和沼泽里寻找后，土坝将会被长出的青草所覆盖，尸体将永远不会被发现。



令人悲哀的策略正起作用

在梅里迪恩那边，当地的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因为没有听到三个人的消息而开始担心起来，玛丽·金用了一个假名，以《亚特兰大宪法报》的名义给六个县所有的警察总部、每个治安官的办公室以及小城镇的镇长们打电话，询问他们是否关押了三名男子。她希望通过伪装成记者，可以为三个人提供一些保护，她的第一批电话之一是打给副治安官塞西尔·普赖斯的，但他否认关押了三个人。

第二天早晨，“自由之夏”运动的老成员担心发生了最坏的事情——施沃纳、钱尼和古德曼成了该运动的第一批殉难者，令人悲哀的是，摩西的策略正在起作用。这些民权运动的工作人员与以前被打死的人不同，他们中有两个人是白人。华盛顿的政客们和纽约的记者们突然对失踪的民权运动的工作人员极为关心起来。

在媒体密切关注的压力下，总统约翰逊不仅私下会见了悲痛欲绝的父母，他还亲自定期向他们通报调查的最新进程，并在电视镜头前向全国保证，政府将动用它所能支配的一切资源，来解开这个谜团。

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下令联邦调查局介入搜寻，派了 140 名特工到费城。美国联邦调查局介入搜寻的依据是 1934 年的林德伯格法，即如果将被绑架的人带过州界线就成了联邦犯罪，该法假定任何人在疑似绑架后失踪 24 小时即已被带过州界线，几天后，从附近梅里迪恩海军航空站抽调的 100 名水兵到了，又过了几天，又增加了 100 名。

许多当地的黑人带着既愤怒又惊奇的心情看待这次大规模的拉网式搜寻。虽然对尸体和凶手的搜寻会使全国团结起来，支持对民权给予更多的保护，但它却也加剧了南方民权运动内部的种族紧张状况，标志着结束种族隔离法的协同努力开始走向终结。

搜寻人员两天后在博格奇托沼泽发现了那辆客货两用车，车子的轮胎已破烧毁，车窗被炸飞，但没有尸体。在接下来的 44 天里，数百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涌进了该地区。

就像摩西所希望的那样，这次搜寻使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种族隔离上来了。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民众希望政府派部队到密西西比州去，好几家报纸都主张联邦政府进行干预，以保护南方黑人的权利。尽管有压力，约翰逊政府还是不愿意要求国会通过一项选举权法案。总统最不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在选举年疏远民主党的南方白人根据地，他的竞选对手，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已经因发表强烈的各州拥有自治法权的言论而争取到了更多的白人选票，约翰逊想在大选之后再让民权人士游行示威的消息出现在新闻

上，如果他能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并在国会参众两院中拥有多数席位，他将考虑这项法案。但重要的事情要先做，对约翰逊来说，首要的事情就是赢得大选。

拥抱一个种族融合的未来

7 月 31 日，当一个收费的线人告诉调查人员失踪三人的尸体被埋在奥伦·伯雷奇农场的土坝底下时，案件终于有了突破。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取得了搜查证，调来了重型挖土机，开始拆毁大坝。8 月 4 日，他们在 15 英尺厚的土层下发现了迈克尔·施沃纳、詹姆斯·钱尼和安德鲁·古德曼正在腐烂的尸体，古德曼的手里紧紧攥着一团粘土，这表明他被埋时还活着。

在 1964 年的夏天，也许只有总统竞选比搜寻这三名民权工作人员的尸体得到了更多的新闻报道，然而，尸体被发现后的第二天，这一事件在报纸头版的位置就被越南在北部湾攻击美国驱逐舰的消息所取代了。

在夏季结束前，反对“自由之夏”的人已烧毁或炸毁了 35 座房子、教堂或其他建筑。尽管每天被殴打、遭逮捕，志愿者们却扩展了他们的活动，向州里的纯白人民主党组织发起了挑战。他们组织了自己的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MFDP)，选出了另一批代表去参加 1964 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8 月 22 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听取了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充满感情的呼吁。范妮·卢·哈默问道：“我们因为想生活得像一个体面的人而每天受到威胁，这还是美国吗?这还是那个自由者的国土和勇敢者的家园吗?”范妮是一个佃农的女儿，她因为组织自由民主党的活动而失去了工作并被从自己家中逐出。当全由白人组成的密西西比代表团威胁说，如果大会让抗议者们入席就座他们就退出大会时，约翰逊担心这场争端将危及他在南方的竞选。作为回应，总统向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提供了两个不分区的席位，并同意将在未来禁止任何实行种族歧视的州代表团参加全国代表大会。

从许多方面来看，“自由之夏”运动在 60 年代初期的希望与理想主义和随后的不和与意见分歧之间划上了一条分界线。三名民权工作人员被谋杀证实了摩西的战略智慧，但也激怒了许多黑人。他们的不满是因为只有当白人被杀害以后，整个国家才开始关注起密西西比州来。1964 年以后，他们不再欢迎白人来参加当地的斗争。由于在南方不再受到欢迎，激进自由派的学生队伍回到了他们北方的大学校园，为一项新的事业去战斗了。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

毫无疑问的是，媒体在 1964 年夏天的极度关注有助于密西西比州的改变。据一位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的成员说：“1964 年以后，密西西比州才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波士顿环球报》的专栏作家柯蒂斯·威尔基认为，那次谋杀“成了一种催化剂，它唤醒了人们，开始了一个漫长的，至今仍在密西西比州进行的救赎过程”。四年后，费城的学校取消了种族隔离，黑人、白人以及乔克托印第安人在费城餐馆里一起吃饭，在城里唯一的电影院埃利斯影院里相邻而坐。

两个月后，林登·约翰逊签署了《1964 年民权法》，这是自重建时期以来，在其同类法律中意义最深远的一项立法。其核心是保证人人平等均可进入公共场所那一节，它也加强了防止持有政府合同的雇主在雇工时出现种族歧视的现有措施，赋予政府为废除学校种族隔离而提出法律诉讼、发现学校在申请联邦项目资助中实行种族歧视时取消其资格的权力。

1965 年 8 月 6 日，在国会大厦的总统办公室内，在 104 年前林肯签署了一项法案、解放了为南部邦联服役的奴隶的同一个房间里，约翰逊签署了《1965 年选举权法》，使之变成了法律。站在林肯雕像的左边，约翰逊讲到了黑人在 1619 年第一次来到詹姆斯敦时的情景，“他们带着锁链在黑暗中到来，今天，我们要打碎这些残酷而又古老的枷锁的最后几根主要的链环。”约翰逊对默不出声的内阁成员和 7000 万电视观众说：“我们大家必须一起来克服这种极为有害的偏见和不公，我们一定会克服的。”

选举权法案授权联邦督查员登记选民，并禁止使用文化考试，从而永久改变了南方的种族关系。毫不奇怪，最具戏剧性的结果出现在密西西比州。1965 年，仅占选举年龄人口 7%的 28500 名黑人进行了登记，三年后，250770 名黑人作了登记。1964 年至 1969 年，亚拉巴马州成年黑人登记投票的人数从 19.3%上升至 61.3%，佐治亚州成年黑人登记投票的人数从 27.4%上升至 60.4%。

这场谋杀也迫使联邦调查局对南方种族暴力行为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在最初行动缓慢地应对这场危机后，联邦调查局很快就改变态度，发起了根除三 K 党的行动。

这一“救赎进程”还包括了对凶手的依法惩处。1964 年 12 月 4 日，联邦调查局为三个人的被害逮捕了 21 人，政府根据美国重建时期的联邦法律(美国法典，第 18 项，第 241 节)指控其中的 19 人犯有合谋侵犯三名民权工作者公民权利的罪行，其最高惩罚是 5000 美元的罚款和 10 年监禁。另外两人以拒绝透露有关犯罪情节被指控。



1967 年，这些被告在密西西比州一个全由工薪阶层白人组成的联邦陪审团前接受审判。政府的主要证据是联邦调查局的一些线人提供的证词，他们确认了九名被告为三 K 党成员，证明埃德加·雷·“传道士”基伦曾夸口说杀害三名民权工作者。

1967 年 10 月，陪审团作出了裁决，七名被告被判有罪，被处 4 至 10 年监禁，八人被判无罪释放。对基伦和另外两人的审判为无效审判，因为一名陪审团成员拒绝判“一名神职人员”有罪。没有一个人面对谋杀指控，也没有一个人服刑六年以上。虽然正义远未得到伸张，这一判决确实是向前迈出了一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密西西比州将杀害民权工作者定为有罪。

过去从来没有过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一代的政治领袖、检察官和民权活动分子已经成熟，他们决心要纠正过去的不公正做法。在这些领袖之中，有一位叫杰里·米切尔的记者。大学毕业后，米切尔开始在德克萨斯州和阿肯色州的几家小报工作，由于深厚的基督教信仰和强烈的社会正义感，他决定运用他善于调查的技能来调查民权运动。

说也奇怪，是好莱坞激起了米切尔对三个民权工作者被谋杀一案的兴趣，1989 年，他看了电影《密西西比在燃烧》。米切尔回忆说：“电影中有一个场面，黑人孩子们手持美国国旗在游行时，警长冲进了人群，把国旗从他们手中抢了下来。”他问一名当年报道密西西比州的当地记者比尔·迈纳，这个场面是否真实，“比尔·迈纳说，‘这事真的发生过，但它是在梅德加·埃弗斯刚被杀害后发生的’。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受教育过程的开始。”

看了电影之后，米切尔潜心研究了那个时期的一些悬案，当他无意中发现了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那些一度保密的案卷时，他取得了重大突破。该机构成立于 1956 年，暗中监视任何试图在该州促进种族融合的人。这些案卷中列有 87000 个人的名字，并记载着那个时代三 K 党杀人的许多细节。该机构一直存在到 1977 年，当它最终被解散时，其档案就被封存起来，直到 1998 年才开放。米切尔在 1989 年就设法看到了这些文件。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米切尔利用档案中的资料写了一系列揭露真相的文章，迫使地方当局更仔细地审查了一些在动荡的 60 年代悬而未决的谋杀案。

在调查过程中，米切尔发现萨姆·鲍尔斯在接受密西西比州档案馆一名馆员的采访时曾吹嘘说，谋杀三名民权工作人员的三 K 党成员从未被抓获，鲍尔斯说：“大家都知道我说的



是谁。”米切尔后来认定，那个人就是埃德加·雷·基伦。2005 年，新的一轮调查使这位 79 岁的牧师因谋杀罪受审。基伦已是一个秃顶且虚弱的人，审判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得接上吸氧瓶，但是，检察官提请由不同种族混合组成的陪审团不要忘记他那恐怖的过去，称他曾安排让警察逮捕那三个人，然后把他们交给了一帮三 K 党党徒。

陪审团最终裁定基伦有罪，法官判处他三个连续执行的 20 年徒刑，为每一名受害者各服刑 20 年。判决时离三个人失踪的那天正好是 41 年。

(摘编自《改变美国的十天》 复旦大学出版社)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启】

罗伯特 L. 赫尔维：论战略性非暴力冲突：关于基本原则的思考

“

如果反对派运动选择战略性非暴力这个途径，就需要考虑非暴力斗争用哪些不同的方法或机制，去产生所期望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的转变

”

第四章 非暴力斗争的机制和方法

. . . 我只是声称，我的每一个试验加深了我如下的信念：非暴力是人类所拥有的最大力量。

——M·K·甘地

不论选择何种途径，使一个社会从独裁转向民主是困难的。如果反对派运动选择战略性非暴力这个途径，就需要考虑非暴力斗争用哪些不同的方法或机制，去产生所期望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的转变。夏普博士列举了四种“改变权力关系的机制”，即改变观点、和解、强迫和瓦解。它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事物的框架，用來观察有关权力关系变化动态的信息。这几类非暴力行动，也可用來作为促进变革或评价过去非暴力行动或运动效果的方法。

本章还介绍了非暴力行动的概括分类：抗议和劝说、不合作、干预。吉恩·夏普列举的 198 种方法見附录二。



机制

要实现政治和社会变革，就必须把战略性非暴力斗争的理论转变成实践。在思想转变为行动时，重要的是反对派选择什么样的机制或程序來影响统治者的态度和行为。这个决策又会进而影响选择哪些方法來达到所期望的、人民和他们政府之间关系的改变。6

改变观点

为了引起变革而用來对付一个对手的不同机制或程序，表述了非暴力行动的意图或效果的不同强烈程度。可能有这样的情况：能够说服当局，采纳斗争者群体提出的某项建议或要求，对当局是有利的。对于斗争者群体來说，改变观点这种机制有许多好处。当局承认变革意图的正当性，能够增加反对派领导人的信誉和合法性，减少同国家直接对抗的潜在风险，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能够保存资源，用于冲突的后期。然而，这一机制通常涉及较低压力的行动，用來对付极端专制的政权时往往显得不足。尽管如此，恰当地选择争论点及其提出方式，用于对付甚至非常残暴的政权偶尔也曾获得成功。

用改变观点对付军事独裁制度的一个例子发生在缅甸。它涉及在公立小学里教英语的问题。在 1962 年军事接管以后，奈温将军决定：英语令人想起缅甸的殖民地历史。他宣布小学不再教授英语。当时，大多数缅甸人通行讲英语作为方便的第二语言。有些观察家也暗示这种转变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为了使人民同外国思想和影响相隔离，剥夺学英语的机会只是当时实行的严厉审查制度法律的延伸。对大学里的英语授课也施加了限制。二十多年以后，当局明白了这种形式的审查制度有重大的经济后果。工人和中层管理人员不能用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进行沟通，外国投资者不愿在这样的地方开办工厂。大学生不再能大量被西方的研究生院接纳。仰光医学院毕业生不再能在外国开业，甚至不再被接受到国外进行专门领域的学习。在企业界和民主派活动分子多年提倡让人们有更多机会学习英语以后，当局软化了，因为它认识到让步对它本身有利。

考虑到战略性非暴力斗争打击的是权力的资源，针对一个政权的支柱而进行的改变观点的努力是能奏效的。在此过程中，第一步要保证让作为对象的组织和机构的成员了解到，他们个人并不是“人民的敌人”，而且实际上，他们会作为民主社会里的成员受到欢迎、理解和尊重。一旦实现了这一目标，作为对象的机构成员会比较容易接受关于需要政治变革的信息以及以后参与具体行动的号召。



改变观点是扩大和加强亲民主势力的主要机制。关于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非暴力行动的新闻，以及巧妙地运用宣传來对比民主和专制政权下的生活，都有助于改变观点的努力。例如，有关示威、罢工、抵制和其他形式的抗议的新闻报导，都会影响公众的态度。最重要的是，应当向公众展示出一个“未來的远景”以及如何能达到那个远景的概念。

改变观点的努力的最强大力量也许是反对专制制度的人们所表现出來的勇气。公开反对压迫的勇敢行动，能消除人们心目中视非暴力抗议者为胆小鬼的那种陈旧观念。勇气是普遍受到尊重的，不论这种勇气是士兵在战场上，还是非暴力战士面对暴政时表现出來的。在有些情况下，反对派团体的成员所承受的苦难，对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态度都可能有狠大的影响。勇气并不总是以个人为了事业所流的血來衡量。愿意勇对某个行动的后果，是衡量勇气的真正尺度。例如，1776 年签署美国独立宣言的那些人，表现了反抗英国国王的狠大勇气，同样，1950 和 1960 年代为结束种族隔离而参加“静坐”的民权活动分子也是如此。这两个反抗行动都曾促使公众认真思考：斗争的支持者愿意冒重大危险去实现的目标的合理性。

和解

有时候，一个政权会容纳民主势力的某个请求或要求。这不是出于尊重或礼貌，而是因为政府可能想缓解社会紧张局势，影响外国政府的态度，给公民留下政府关怀人民福利的印象，或者在反对派能够利用某个争端以前了结这个争端。这个政权并没有受到强迫，而是它判断它的利益没有直接受到威胁，也不会因为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向反对派让步而被削弱。现实是这个政权对绝对权力的控制已经被削弱了，它对可能激发公众对政府不满的一些问题已经敏感。新闻里常有专制政府作出这类和解的报导。仰光的军事政权和共产中国的领导人在外国要人來访时往往释放少数犯人，一部份是为了适应对政治改革的要求。以色列政府经常作出象征性姿态，來适应美国政府以人道对待巴勒斯坦人的要求。政府选择作和解处理的这些争端，大多被它们看作是恼人的，即使答应了也不会威胁它们对权力的控制。换句话说，它们可以作这样的决定，而只有狠少看得到的风险。

政府向反对派团体提出和解的近例，包括从象征性姿态一直到貌似自由的选举。例如，1988 年，为了回应公众对立陶宛共产党政权日益增长的抗议，该国最高苏维埃指望通过接纳民主运动的要求修改宪法，以便给立陶宛语言官方语言地位和准许在一个历史遗迹升国旗，來缓解紧张局势。到那时，在“联合委员会”、“改革运动组织（sajudis，萨尤迪

斯)”和其他支持团体领导下的民主运动，已经如此广泛和强大，政权方面仅仅象征性的和解已不能令人满意了。7 结果，反对派提高了它作为民主改革力量的信誉。

2002 年，萨达姆·侯赛因决定允许一个宗教仪式，是和解的又一现代例子。尽管萨达姆·侯赛因绝对控制了伊拉克社会，他仍然同意了什叶派信众的要求，让成千的人游行到巴格达郊区的一个宗教圣地。侯赛因可以拒绝那个要求，他肯定有足够的军队和警察來执行这样一个禁令，但他手软了，可能是希望避免又一次点燃对他的统治的公开和激烈的反对。8

勉强接受自由选举的呼吁，是一个政权所能提供的最极端的和解之一，然而这种选举的诚信几乎总是遭到损害。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里，专制政权在其境内允许“自由”选举的例子狠多。

1990 年缅甸的选举显示，政府如何暗中策划人民选择的结果。缅甸的奈温将军在下台以前，他最后的官方举动之一是呼吁多党选举。在他 1988 年 7 月退休前几个月以來，一直有示威要求政治变革，包括多党选举。奈温考虑到，多党选举如果不能消除对独裁统治的公开反对，至少能减少这种反对。既然他的政权已经证明有能力操纵选举，他感到在一个反对派无可救药地分裂的选举里，他可以保证得到投票箱的胜利。9

当一些团体选择可能取得和解的争议点时，重要的是如果得到和解的话，它的用词应当让统治者在公众眼里“显得有颜面”。与此同时，公众应当了解，当局的和解反映了非暴力运动力量的增长，而且改善社会的变革不一定要导致流血。“改变观点”和“和解”的累积效果，增强了社会的力量并为社会采取更强的行动做好准备。

专制政权常用选举來容纳反对派对政治变革的要求。遗憾的是，对于公众來说，反对派领袖往往天真地假设选举会是自由和公平的，而且公众能经受政府的恐吓，或者国际观察员能保证计票过程的诚信度。2000 年在塞尔维亚和 2002 年在津巴布韦的选举，就是被操控的选举得到不同选举结果的例子。

在塞尔维亚，政治反对派建立了一套从投票箱直到贝尔格来德选举中心办公室的选举监督系统。他们有一个训练有素和组织完善的“鼓励投票”竞选队伍。还有一个如果政府企图在选举中舞弊，就采取的行动计划。反对派及早报告从计票站得到的选举结果，反映民主派取得了胜利，而且在正式结果汇总以前就公布了选举结果。当政府透露说，根据政府的计票，反对派没有赢，人民就走上街道宣告他们的胜利，群众示威遍及整个塞尔维亚。这些示威最后以向议会进军达到高潮。准备工作做得如此充份，以至在新政府宣布成立并就职时警察和军队都没有干预。



2002 年 3 月津巴布韦的选举结果就大不相同。在津巴布韦，反对派“民主改革运动”(movement for democratic change, mdc) 围绕一个“鼓励投票”竞选运动和国际上要求自由和公平选举的压力，制定了战略。他们狠少注意制定一个“b 方案”，一旦在职的罗伯特·穆加贝窃取选举时就执行。然而，早有迹象表明，穆加贝根本不打算放弃权力。他以食物和薪金为允诺，组织了年青的民兵，用棍棒和刀武装起來，指示他们去攻打反对党的工作人员。民主改革运动的支持者和被怀疑想投穆加贝反对票的人，受到殴打和恐吓。民主改革运动的总统候选人以叛国罪名被捕。警察和情报人员卷入对公众的恐吓。甚至在选举日，有报导说，在国际观察员眼皮底下，排队等候投票的公民被殴打。來自某些欧洲国家的观察员被驱逐出境。在选举日，投票站被转移。这是政府的一个策略，使选民不知道该在哪里投票。在计票时，数以千计的选票下落不明。穆加贝宣告了胜利。由于没有详细的计划或能力去坚持实行人民选举的授权，民主改革运动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宣称选举既不公平也不自由，而要求重新选举。没有任何保证新的选举会有不同结果。

这里的教训是：对执政者來说选举太重要，不能输掉，因为失败就意味着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社会失去合法性。同理，对民主反对派來说选举也太重要，不能输掉。应当做好准备，保证公众准备在投票箱验证他们的投票，而且有周密计划的措施，挫败政府操控选举结果的企图。

强迫

“改变观点”和“和解”允许压迫者选择接受或拒绝非暴力反对派的请求或要求，而不会有或狠少有立即的后果。可是，“强迫”能迫使当局屈服于向其提出的要求。到了强迫能够奏效的那一点，一个政权的权力已经大大地削弱了。反对派团体需要懂得，过早地企图强迫，可能削弱他们自己在公众眼里的诚信度。只有在缜密计划和对成功的可能性进行客观分析以后，才能提出挑战暴虐政府生死存亡的强迫性要求。如果不能保证强制对方接受所提出的要求，就必须考虑推迟或换一个方式提出要求。

政党和学生团体有时提出无法坚持实行的“要求”。比较妥善的做法是：让当局知道组织的目标，而只有在动员了公众去发展本团体制定战略计划的能力和削弱政权的权力资源以后，才把这些目标变成具体要求。举例來说，如果有一个“要求”是“自由和公平的选举”，那么政府拒绝该要求的话，用什么來制裁它？强迫，当反对派的要求在违背政府意愿的情况下得以实现时，是成功的。在 2000 年 10 月塞尔维亚选举的例子里，当米洛塞维奇政府宣布需要进行第二轮选举的同时，反对派团体已经宣告选举胜利。预見到政府会在



选举中舞弊，在选举前就完成了通过战略性非暴力斗争夺取政权的详尽计划。数十万塞尔维亚人走向议会大厦并占领了它，决定性地剥夺了独裁者的权力。米洛塞维奇没有能力反对他的被驱逐。他的主要支柱已经蒸发。警察拒绝守护为了阻止抗议的民众进入贝尔格来德所设置的路障。军队也拒绝为米洛塞维奇进行干预，理由是选举是一个政治事务，不需要军事干预。撤除这两个支柱，是几个月來密集努力的结果，使军队、警察和政府成员相信民主变革不会减少他们的重要性，或导致他们的领导层被清洗。米洛塞维奇狠快就意识到他的权力已经丧失殆尽。

虽然有实例证明反对派团体以非暴力强迫的威胁能够取得胜利，但只有威胁而没有可信的行动能力，反而会损害一个运动。2002 年在津巴布韦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两次号召举行总罢工都没有实现。只有经过几个月的计划和协调以后，才实现了一次成功的罢工。企图强迫，而没有实施所威胁要实行的制裁的能力，会使民主斗争失去势头；公众的积极支持会减少；国际上的支持者也会怀疑运动的生命力。在计划和执行重大非暴力战役时，必须考察对能力的评估，才能避免运动发生这样的不利后果。

瓦解

如前所述，反对派有能力强迫统治者，反映了权力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重新分布。一旦反对派意识到权力的天平已经向自己这方面倾斜，就应当使用不合作和干预等比较强力的方法，在更广大的战线上向政权发起进攻。如果持续这类攻击，政权就会瓦解，因为维持其统治所需的权力资源已不复存在。

如果反对派认为有必要使政府瓦解，那就不能减少非暴力行动的强度和广度，直到政府垮台为止。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反对派势头的减弱，可能使政府有机会重新坚持其权力。如同军事战役里当敌方防线的連续性遭到突破，敌人企图撤退时所出现的“扩大战果，乘胜追击”阶段一样，必须以最大的强度，并愿意冒更大的风险，继续进攻，使战役尽早结束。一个军队没有战略计划，就可能无法迅速反应和增加突破口的兵力。非暴力斗争也是如此。

非暴力行动的方法

非暴力的行动支持并反映非暴力变革的机制。反对派针对其对手所能使用的非暴力行动的方法有狠多，并且有不同种类。在《非暴力行动的政治》一书中，吉恩·夏普列举了几乎



200 种方法（附录二）。他还指出，这个清单不是详尽无遗的。实际上，他鼓励人们创造性地思维，对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方法。

以非暴力行动反对暴政，往往会遭到暴力报复。必须预料到会有殴打、拷问、监禁及其它制裁（暴力的、经济的、社会的）。然而，当政府以这种方式反应时，反对派往往可以广为宣传这些行径，以加强公众对民主运动的支持，通过揭露政府的残暴和置疑其合法性來削弱它。过去一个世纪的一些运动中，拘捕和监禁被视为光荣的印记。

选择什么非暴力行动方法为恰当，取决于用它要达到什么目标。有时候，一个运动或一些组织可能根据某种偏好或已知的能力选择某个方法，然后可能，也可能不，为这个非暴力行动选择一个目标。这种做法“本末倒置”。理想的情况下，应当先考察目标，然后查看方法的菜单，选择提供有利于实现战略和战术目标的适当手段的那些方法。为了方便思考，方法可以分为三大类。即抗议和劝说、不合作、干预。

抗议和劝说

抗议和试图劝说的行为向政府提出一个信号，表明亲民主的力量对政府的某些作为和政策有严重的不同意見和異议。这些抗议的意图主要是象征性的。此外，这些行为也让公众知道，非暴力的反对派运动正在挑战政府濫用权力的某些具体行为。虽然，非暴力抗议和试图劝说的行为可以有利地运用于战略性非暴力运动的任何阶段，但它们通常是在斗争的早期，甚至是公开创始时引用。

不论选择什么方式的抗议和劝说，这些行为应当得到广泛的媒体报导。示威和抗议信如果没有人知道，不会产生什么效果。在 1960 年代的越南，吸引全世界注意的一个抗议和劝说的惊人例子，是几位和尚为抗议美国支持的西贡政府而自焚。这些自杀行为确实让许多人思考，为什么一个人会经受如此痛苦的死亡作为政治抗议的手段。这一牺牲的目的是达到了，在狠大程度上是由于组织者邀请了国际新闻单位來报导和拍摄这个事件。

这些方法并不构成对第一章里讨论的，对手的权力资源的直接攻击，而是一些间接攻击，旨在把政府的行动揭露在公众面前，表达对这些行动的異议，并试图劝说政府和其他人需要变革。非暴力斗争远远不只是表达不满。

不合作

不合作是反对派运动可以运用的最有力的一类非暴力方法。在战略范围内机智地选择和计划这一类行动，会增强去除政府权力资源的可能性。全体人民，而不只是服兵役年齢的男



子，都可以攻击政府的权力资源（即权威、人力资源、技能和知识、物质资源、无形因素、制裁）。任何政府，没有人民的合作就无法生存。不合作试图传递的信息是：“我们，人民，不再帮助政府压迫公民。”其目标是让政府难以运作。当所选择的行动支持非暴力的战略，而且是精心策划而不是杂乱无章的时候，不合作的影响最大。

与针对政府的支柱所进行的国内的不合作战役相结合，还应当致力于争取国际的支持，实施以取消合作为重点的制裁。在国际层面上以及国内的不合作，有助于政治变革的支持者。取消国际上对政府的支持的手段包括：劝阻或禁止投资或进口，在国际论坛上反对该政权的政策，限制官员申请签证，限制本国公民到暴政所在国旅行，将外援局限于非政府组织所管理的、直接用于人道需要的项目。

社会性不合作

国内的每一个人都能实行社会性不合作。避免与指定的政府成员有社会性來往，对官员和他们的家庭成员來说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社会名流可以停止邀请政府官员参加社会性集会，拒绝参加政府资助的和预期有官员在场的私人社会活动。可以从邻居和非政府组织举办的社会性集会的邀请名单上，除去政府官员的孩子和其他亲戚的名字。家长可以不让孩子同政府官员的孩子見面或交友。回避社交活动能传递这样的信息：人们不能容忍那些支持政府的人。但是，这种回避应当审慎和精确地使用。如果用得不当，它会干扰正在进行的，把政府的支持者引向反对派阵营的努力。可以抵制给当局增添光彩的社会活动和体育比赛。甚至穿着令政府不悦的衣服，也是一个不合作行为。被选为不合作目标的那些人，狠快就会意识到这类不合作所传递的信息。

在美洲处于殖民主义的时期，麻萨诸塞州的总督有一次埋怨说，尽管他代表英国国王，他却只是一个囚徒。没有人服从他，当地的民兵不理他，人们无视他的命令和指示，教堂的成员也躲避他。

经济性不合作

所有的政府，都需要有收入才能提供人们要求它提供的公共服务。基于这个显而易見的事实，作为战略性非暴力行动的一种方法，经济性不合作旨在通过破坏或减少对政府支持者的经济刺激，來攻击对政府的支持。为了购买执行政策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需要有资金。通过减少或拒绝提供必要的资金，经济性不合作能够损害政府保持其支持者的效忠的能力。



拒付或少付税（“避税”）是经济性不合作的一个例子。同样的例子还有：消费者抵制能给政府提供收入的产品或服务；举行有助于造成经济不稳定的罢工；挤兑银行存款从而引起国际投资者不能不顾的金融危机。此外，有时能劝说国际公司、行业协会、国际非政府组织等拒绝同指定的政府进行经济合作，从而进一步削弱政府的经济健康狀况。经济不稳定不仅导致政府支柱的削弱，它还分散了和限制了政府反击反对派的政治性不合作的努力——这对非暴力斗争的总体战略目标是一个不小的贡献。

在战略性非暴力斗争中，跟踪政府进出的硬通货流动狠重要。其目的是找出这一路上有哪些点容易受经济不合作方法的攻击。在有些情况下，硬通货來源于自然资源的销售，还有由于勞动力低廉而出售的产品和服务。对于出口，运用经济性不合作方法最有效的对象是在出售地，而对政府进口來说，最易受攻击的是在商品的产地。

政治性不合作

针对一个政府的任何和一切不合作行为，作为战略性非暴力运动的一部份，都带有“政治”性。不过，吉恩·夏普还是在他的“198 种非暴力行动”中（見附录二），列举了 38 种具体的政治性不合作行为。这些行动主要旨在拒绝权威，即一个政府或一个占领国的权力的主要來源。政治性不合作的一个附带好处是，它同时有助于加强公民社会的力量。民间组织能取得经验和增强它们对政府采取行动的能力的信心，不论是单独行动或是与其他志趣相同的团体共同行动。

政治性不合作是对政府的直接攻击。可以利用声明、宣言、以及拒绝政府自认的权威从而拒绝承认其合法性的其他文件，使公众相信政府无权行使其权力。在这些抗议行为以后，再继之以抵制政府机构，公务员怠工，和一般公众有无数机会实行的公民不服从。如果广泛而坚持不懈地实行，就能使一个专制政府的权力失去效用甚至瓦解。

干预

干预的行为，就是其意图或效果是破坏既定的行为模式、政策或机构的那些非暴力行动。这些行为也可能有创建新的行为模式、关系，甚至新的机构的效果。由于这些方法比较直接地挑战现狀，它们对当前的争端提供比较立竿見影的能見度，对权威的比较直接的挑战，以及比较迅速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同旨在抗议和不合作的行为相比，干预的行为也可能导致更快的和更严厉的镇压。



美国最近的历史提供了一些例子，说明第三方的干预能如何有效地改变既定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关系。在美国的民权运动期间，在午餐柜台前的静坐就是能見度狠高而且狠有效的行动，直接攻击并迅速终止了餐馆里的种族歧视。而且，这些运动还带來了促使立法解决更广义的种族歧视问题的必要的能見度和迫切感。这些行动发生以來，已经过去数十年，人们有时忘记了在静坐时曾经发生的暴力。静坐引起无数殴打事件、放出警犬及其他暴力行为。当局往往施加的这种暴力，引发了政治柔术，即对和平抗议者施以暴力的权力刺激了更加强大的正义力量去反对种族歧视。10 在反对专制政权的战略性非暴力斗争中，站在人民这一方的正义力量不一定是全国的政府，而是可能需要來自国际社会的增援。

2002 年 12 月国际和平部队被派往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省是国际干预的一个例子。他们的任务是陪同人权观察员和人道援助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遭到反对改变亚齐省政治地位的人暴力攻击的威胁。与此同时，这些国际观察员的在场，也制止了那些主张自治或独立的团体的成员对印度尼西亚政府当局实行暴力。国际干预的又一个例子是用外国人做非暴力保镖，保护巴勒斯坦农民和其他平民不受以色列移民和以色列国防部队的攻击。

干预的行为能削弱政权的支柱，也可能加速这些支柱的崩溃。有了一个慎密考虑的战略，就能够迅速调整支持计划，去利用眼前的机会。如果没有一个预見到会有需要调整的战略和计划，势头就可能减弱。而势头的这种减弱使对手有时间反应和重新组合。反之，如果政府的机构感觉到干预者的行为直接威胁它们的生存，它们的成员就狠可能会团结在领袖周围而准备“殊死搏斗”。为了减少政府支持者受围困心理影响的这种可能风险或其冲击，应当考虑并及早实施一个以这些权力资源为对象的宣传活动。

第七章 作战计划的考虑因素

一个基本原则是永远不要保持完全被动。

——卡尔·冯·克勞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战争论》

非暴力斗争在战略和战术层次上制定作战计划所需的各项任务，对计划者提出许多挑战。在最好的条件下，有如何协调一个松散联合体的各成员的问题。这些成员的能力往往被过高估计，他们的期望又各不相同。把这些期望整合成为共同的目标，对于往往缺乏战略性分析和计划经验的运动领袖们來说，就成了极艰巨的任务。甚至在这些不同团体之间进行



沟通都有困难，因为许多团体已经产生了自己独特的非暴力斗争用的语汇，或者不懂得那些通常与非暴力斗争有关的用语背后的概念。13

军事计划通常是在一个有明确上下级关系的组织环境里进行的。然而，一个非暴力运动的组织环境，通常是一个“对等者”的联合体。所有的“对等者”争着要当“对等者中的头头”。不同团体之间总会流传这样的指责，即他们当中哪一个团体被政府特务渗透了（事实却可能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已被渗透）；在用什么形式的政府取代所反对的政府上可能有分歧；有的领袖可能被其他人认为太专制，实际上经不起一个民主社会对政府权力所加的限制（军阀协助推翻另一军阀，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有些人可能参与非暴力斗争，直到开展武装斗争的能力成了一个现实的选项。尽管有这样不同的意图和相互猜忌，还是必须制定战略及其支持计划。

安全保密的考虑

针对政府而开展斗争的每一个反对派团体，在某一时刻总会被它所攻击的政府当作目标而且被渗透。作这样一个假设是深谋远虑的。虽然被渗透可能是一个严重问题，但也可以利用政府情报人员作为一个通道，有选择性地向政府传递一些信息。运动的领导者愿意传递给政府的信息可能包括如下的情报：运动打算坚持非暴力；运动不打算志在报复；对政府官员的大赦始终是一个选项；反对派的打击目标是容许违反人权和产生腐败的“制度”；运动并不是反对所有为体制服务而同时又是体制的受害者的那些人。让政府通过它自己的特务“发现”运动的如下打算也许有用处：在新的民主制度里将容纳军队、警察、公共服务机构的人员，只要他们承认新政府的权力，并宣誓忠于新宪法。让政府通过它自己的特务“发现”有一个参与行刑逼供和非法处死行动的人员名单，也许有用处。这些特务能够准确地报告：对于每一个这样的人，存在着一个档案，里面包括此人虐待及其他犯罪行为的具体指控、能够指证虐待行为的受害者照片、证人宣誓的证词、包括一些反对政府所鼓励的压迫和暴行的军人和警察的证词。此外，混入反对派运动内部的政府特务也能够向他们的主子传达：为了妥善保管，所有这些收集到的信息的副本已经安全地储存在国外。

战略性非暴力斗争的某些方面不可能、也不应当保密。显然，有人反对暴君，这样的事实对暴君來说不足为怪。同样，发现有一些组织正联合起來抵抗暴君，也不会令人惊讶。可以肯定，任何专制政权都会知道近年來那些成功的非暴力斗争，以及这些斗争是怎样展开的。14 同样，作战计划的信息有时间性，就是说，一旦作战已经实施，这些信息的价值就大大降低了。



虽然在许多情况下政府了解民主运动的计划及其斗争的概念，对运动反而有利，但有一些活动需要向对方保密。一般來说，要保密的信息包括主要领导人、了解涉及不止一个组织所计划采取的行动详情的人员、以及如果被政府逮捕可能有生命危险的其他人员的所在和行动。塞尔维亚抵抗团体 otpor(“抵抗”)产生了一个其大多数成员不认识的领导班子。这个领导班子从來没有全体一起見面，而只是根据需要个别进行短时间会面。

把负责计划的那一部份同运动的整体保持距离的另一种做法是反对仰光军事独裁的各亲民主势力的协调组织——缅甸联邦民族委员会——所采用的办法。它建立了一个政治反抗委员会，來开发战略分析、制定计划以及协调各成员团体的非暴力活动的能力。这个团体受缅甸联邦民族委员会直接领导。

把信息加以组织的价值

经验表明，为了帮助军事指挥员作出正确的决定，有些种类的信息是永远需要的。保证这些信息狠容易得到，是参谋部的责任。与其等待上面指派要提供这些信息才去收集，参谋部的人员一直在寻找为作出正确决定所需要的信息，加以分析，并把信息分类归档，分别存放。这样，当某个将军走进司令部并问道：“敌人现在在干什么？”，参谋官就能够提供及时的信息。有了这样的信息，这位将军就能够确定对方的行动对他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计划有哪些影响，还能够辨认有哪些机会可以发动进一步的进攻行动。

非暴力行动的计划人员不应忽视几个世纪以來军队在计划和执行作战方面的经验。军事计划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它的系统性：制定战略性的情况判断，选择作战方案，制定明确的任务说明，和拟定作战计划。此外，如果遵循一定的格式和标准程序，则信息就会在每一个计划文件里以同一顺序出现。

军事作战计划格式含有关于目标作战区域里敌方和其他友方部队正在做什么的重要信息，计划的目标，以及有哪些资源可供利用。考察军事作战计划格式，提供了一个例子：如何组织信息，以最好地满足将要负责贯彻此计划的那些人的需要。如下文的提纲所示，同样可使它适用于各个层次的非暴力计划工作。

作战计划的一种格式

1. 情况。下面各分段提供了目标区域作战环境的简要叙述。

a. 友方情况。在此分段中，提供有关目标区域附近友方单位活动的信息。此信息只限于为所分配的任务的指定作业拟定详细计划时需要考虑的信息。



b. 敌方情况。此段描述目标区域附近敌方部队正在进行的活动。

2. 任务。这是明确指出作战的“谁”、“什么”、“哪里”、“什么时候”和“为什么”的说明。关于谁将负责执行此任务，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什么时候开始战斗，为什么需要执行此任务，应当非常明确，毫无疑问。

3. 执行。

a. 作战企图。此分段描述计划制定者设想战事如何自始至终展开。讀者“看到”任务背后的“想法”。它可能包括进一步使意图明确化的若干“阶段”：

（1）第一阶段。准备。描述使分配到任务的各组织充份达到其能力所应采取的行动。

（2）第二阶段。描述从行动开始到达到目标这段时间里可能发生的事。

（3）第三阶段。如果适当的话，此分段及其他分段可以用來指明为巩固目标所应采取的行动，或者描述可能分配哪些后续任务，让各组织能超前考虑下一个任务。

b. 具体任务。此分段指出分配给参与此次行动的各组织的具体任务。

4. 行政和后勤。此段指出取得为作战提供支持的行政的和后勤的协调安排。

5. 指挥和通信。如果此次作战有特殊的通信和报告方面的要求，这些信息就会出现在这一段里。否则，这一段就只包含狠简短的一句话“按标准作业程序”。对于非暴力行动來说，此段也许称为“协调和通信”比较好，以反映需要认识到在参与行动的人们和负责协调各有关单位的人们之间必须要有沟通。

在此格式中，没有包含有关假设的一段。当一个计划文件变成“命令”时（即当作出决定执行该命令而且已经发布时），计划里所作的假设就被删除。文件最后则列有该计划的参考附件（例如宣传支持附件）目录。计划和命令的发布有遭到泄露的风险。非暴力运动计划人员所做的假设，对反对这个运动的政府來说是重要的情报。仅仅陈述某个假设，就透露了什么是不知道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被认为是重要的。假设还透露了计划编写者所掌握的分析的质量。附件里会包含有关运动的能力和意图的详细信息（例如一个宣传或通信附件里所包含的内容）。对方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在计划或其命令执行以前就先发制人对付或抵消某些事件。

上述來自军事领域的具体格式不是唯一可以用來做计划的格式。可以对它进行裁制以适应几乎任何组织，也可以制定一个新的格式。不过，从事为政治变革而斗争的任何组织，应



当采用包括所有关键信息的某种格式。使用这样一个格式，不仅可以指引人们制定一个完整的计划，而且可以避免遗漏重要的信息。此外，一旦习惯于此格式，其讀者会知道到计划的哪里去找特定类型的信息。

控制措施

为了在一个战役中有助于协调许多团体的行动，计划制定者有若干选项可以用來作为控制措施。例如：

1. 时间。当作为一个较大行动的一部份，需要发生某个事件时，有可能不得不从另一个组织调用根据预定计划其他行动也需要的资源。因此，对该事件规定一个“不早于”或“不迟于”的时间范围可能比较恰当。如果该事件是形成一个群众行动的一个组成部份，就需要指定一个“开始行动时刻”，使得每一个行动都同时发生。在尽管出现大量残暴的军警，而行动仍必须发生的场合，可以根据预计的军警反应时间，计划“闪电式”（打了就跑式）示威。在这些条件下，可以计划一个在数分钟内就达到目的的示威。

2. 边界。一个战略可能要求在不同地区开展战役，而且行动各自分开比较合适。例如，如果对信息的分析表明，某一省里的一个具体支柱，用促进和解的方式來进攻它比用强迫的方式可能更有效，那就可能需要限制某些行动，以便集中力量于针对那个支柱的行动。

3. 协调点。当不止一个组织为采取共同行动而存在于同一邻近地区时，应当指定一个具体地点，作为协调和交换信息的联系点。

4. 其他。还有其他可以考虑的控制措施，如集结地域（在某一行动即将发生以前），或集合点（当突然需要改变示威地点时）。总之，采用一个或多个控制措施，是为了保持影响所计划的行动结果的能力。一旦失去控制，就可能达不成目标，伤亡的概率增加，在参与者中间造成混乱。

对支柱要拉，不要推

战略性计划应包括努力吸收暴君的支柱的主要官员的亲友参加民主反对派。在这一点上，需要强调把支柱的主要成员向反对派方向吸引，而不是采取把他们更深地推向政府的权力机构核心的方法。[見图四，拉还是推支柱]。应当让暴君面臨这样的问题：被指望去逮捕、恐吓和虐待他们自己家人的那些人，他们会继续效忠吗？对于一个镇暴部队的指挥员，当示威游行队伍的前列里有他的儿子或女儿时，要动用警棍、刺刀和毒气自然会有困难。按照邏辑，不得不用一个经验较少的指挥员來取代这个指挥员。同样按照邏辑，被取



代的指挥员会成为民主反对派吸收的对象。随着政府的支柱被无情地侵蚀，它也就会面臨无穷无尽的困难。

能力与意图

战略性计划的另一个考虑因素是能力与意图。一个对手有能力做些什么，是不会突然改变的。但是，他的意图可以狠快改变。因此，计划里考虑到了能力，就能适应意图的改变。如果把注意力集中于能力，那么当对方改变其力量的使用和部署时，我们也许会感到意外，但那些改变不至于产生瘫痪性的震惊。战略性判断给战略计划者提供了对手所拥有的能力的清单。

给对手制造困境

不论政府如何响应民主运动所采取的主动行动，一个经仔细推敲的战略会试图创造吸收成员的机会。如果政府镇压抗议者，只会更加脱离群众，增加吸收成员的可能性。如果政府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同意运动的要求或请求，运动就可以宣告：基于运动日益能够迫使政府屈从人民的意志，这种和解是一个“胜利”。这又一次提供了吸收成员的机会。计划制定人员应当不断寻找机会，将政府置于其结果总是不利的政治困境。计划人员应当识别人民的一些坚定的信念，并挑动对手采取与这些信念相反的行动。例如，宵禁和对大型集会的限制，狠可能干扰宗教性的和传统性的节日和仪式。

最著名的“两难行动”是甘地在印度争取自治运动中于 1930 年所领导的食盐进军。甘地找到了一个对印度的所有阶级和种姓都有号召力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会迫使英国殖民主义政府要么逮捕他，这将“点燃整个印度”，要么不逮捕他，这将“让他（甘地）点燃草原。”15

100 多年來，英国人对食盐生产实行了国家壟断。食盐是不可少的食物，因此每一个人都不得不购买官盐。食盐的生产不需要什么技术（收集海水、让它蒸发、然后把盐刮起來），这是一个狠容易打破的壟断，只要人民开始自己制盐就行了。政府狠清楚，如果甘地宣布的制造盐的意图不加以制止的话，会有什么结果。政府没有采取行动（它在食盐进军成功地打破壟断之后数周才将他逮捕），于是证实了不合作主义是破坏一个政府权力资源的有效的非暴力武器。16



结语

战略性计划首先从政策性目的引伸出清晰的目标。战略性计划的有效性在狠大程度上有赖于制定意图明确的计划，保持任务与能力一致，注意细节，以及预見到对方的响应。这些计划最好通过一种系统性的方法來完成，其中包括用一定的格式來组织信息。

注释

6 关于机制和方法更详细的论述，見吉恩·夏普所著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非暴力行动的政治》），第二、三卷。

7 grazina miniotaite, nonviolent resistance in lithuania: a story of peaceful liberation （《立陶宛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一个和平解放的故事》），（波士顿：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2002），第 30 页。

8 据报导，萨达姆同意可以游行，条件是不得展示任何旗帜或标志。游行者遵从了，但根据某目击者，他们“以如此的响声用脚踩地，一个街区以外都能听見。”

9 在起初拒绝多党选举的设想以后，仰光政权同意在 1990 年 5 月举行多党选举。出乎政府的意料之外，全国民主联盟（NLD）赢得了 80%以上的选票。当局于是拒绝了选举结果，重新镇压了政治反对派。

10 政治柔术简短定义为“在为改变权力对比而进行的非暴力斗争中可能起作用的一个特殊过程。在政治柔术中，对手针对非暴力抵抗者所采用的暴力镇压造成的反感，转而在政治上对对手不利，从而削弱他们的权力地位，同时增强非暴力抵抗者的力量。”较完整的定义見附录一，“非暴力斗争中的重要词汇。

13 阿尔伯特·艾因斯坦研究所编撰的，推荐使用的非暴力斗争词汇見附录一。

14 見 peter ackerman and jack duvall, a force more powerful: a century of nonviolent conflict （《一个更强大的力量：一个世纪的非暴力冲突》），(new york: palgrave, 2000)。

15 同上引文，第 88 页。

16 关于甘地对战略的探讨，更详尽的论述見 Gene Sharp, Gandhi as a Political Strategist,（吉恩·夏普，《政治战略家甘地》）(Boston: Porter Sargent Publishers. 1979)。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彼得·艾克曼，杰克·杜瓦：《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引言



彼得·艾克曼，国际非暴力抗争中心成立董事。

> 冲突中一方的选择并不因另一方使用暴力而预先被限定，而且其他的非暴力措施可能是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

正义和力量必须结合在一起，这样，所有正义的可能都是有力量的，而所有有力量的可能都是正义的。--帕斯卡尔

故事

在 1981 年 12 月的一个星期五晚上，列赫·瓦文萨以及团结工会的其他领袖们在一次会议后于格但斯克被捕。在十六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的自由工会运动通过占领工厂和举行罢工而动摇了波兰共产党权力的基础。那时已经实行了戒严，而团结工会在枪杆子的逼迫下眼看着就要失败。不过，当他被带走时，瓦文萨质问逮捕他的人。他对他们说：“就在这一刻，你们输了。”“我们被捕了，但你们却加速了你们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你们会跪着回来找我们。”1 如果只有暴力才有力量，而且如果没有应对压迫的方法，那么，瓦文萨的说法就是荒诞不经的。不过，他明白，团结工会已经通过让政府得不到波兰民众的认可而决定了抗争的走向。当国家穷尽其强制他们服从的办法时，它就不得不进行妥协。七年之后，曾经关押瓦文萨的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邀请他与团结工会其他领导人参加圆桌会谈，而该次会谈的结果是新政府的选举和组建。瓦文萨在 1990 年成为波兰的总统，而仅仅在十年之前，他还只是造船厂的一名电工。他从未开过一枪，团结工会中的其他任何人也没有。不过，他们一起撕毁了专断权力的遮羞布，并将自由带给每一位波兰人。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瓦文萨与其他许多国家首脑一道在每年的九月份聚集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开幕式。这些先生和女士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和总理。如果这种会议是在一百年前举行的话，除几个人之外的其他所有人都会是国王、皇帝、将军或者其他凭借暴力手段或王朝继承获取权力的统治者。这是二十世纪带来的最为重大的政治变化，可是，若没有那些凭籍非暴力力量而非武装力量反抗压迫性统治者的普通民众的行动，这种变化就不会发生。本书的主题就是，这种力量是如何发展并被加以运用的。

这一历时一百年的故事讲述的是以非常不同于枪炮和子弹的武器与根深蒂固的政权或者武装力量抗争的民众运动。在所有这些抗争中，破坏性的举措被用作惩罚手段，也即用以牵制或惩处对手并赢得让步的进攻性措施。诸如请愿、游行、罢工和示威之类的抗议被用来动员民众对运动的支持。诸如罢工、抵制、辞职以及公民不服从之类的不合作形式有助于打乱政府的运转。诸如静坐、非暴力的蓄意破坏以及设置障碍物之类的直接干扰行为打击了许多统治者压制其民众的意志。2 历史上的成效是巨大的：独裁者被推翻，政府被颠覆，占领军受到阻遏，并且压制人权的政治制度被摧毁。由于人们进行非暴力抵抗以摧毁他们的对手主导事件的能力，很多整个的社会就因此被改变了，不管是在突然之间还是逐渐地改变的。本书以及我们帮着制作的与之相伴的系列电视纪录片的核心问题是，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作为非暴力行动之根基的理念。

所有这一切都肇始于俄罗斯。在鲍里斯 叶利钦于 1991 年站上莫斯科的坦克并大声嘲讽政变企图之前八十六年，俄罗斯人向圣彼得堡的冬宫游行，以向沙皇呈交请愿书。在这两个时刻之间展开的是一个充满动荡的世界性的演化过程，而这一演化导向对力量的一种新的理解：真正的力量来自它所辖制的那些人的认同，而不是来自对他们的暴力威胁。在反对独裁政权、侵略以及蔑视人权的伟大抗争中，这种观念诞生了，而标志着其诞生的是那些非凡的个人所做的决定以及他们的成功和失败：

一位东正教的教士-乔治 加蓬-在 1905 年说服 150,000 名工人同意在俄罗斯古老首都冰雪覆盖的街道上游行-这是二十世纪对专制权力的第一次公开抗争。他激发了全国范围的群体行动，其结果是，该国首次出现由民众选举产生的全国性议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布尔什维克夺取俄罗斯政权打开大门，并要求德国支付赔款。在此之后，鲁尔区的矿工和铁路工人们于 1923 年抗击入侵的法国和比利时士兵-他们是被派来攫取德国的资源的。他们拒绝合作并破坏侵略者的目标，直到英国人和美国人施压让军队撤出为止。



莫罕达斯 甘地在 1930-1931 年间在印度领导反对英国人的大规模公民不服从行动。他说服其跟从者停止支付盐税并不再购买由英国统治者所垄断的布匹和酒饮料，借此强化该国富有成效的迈向独立的长期努力。

在二战中的德国占领期间，丹麦的公民拒绝支持纳粹的战争努力，并在 1944 年夏天让他们的城市陷入瘫痪状态，以此迫使德国人结束宵禁和封锁；纳粹占领下的其他欧洲国家的民众也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抵抗。

萨尔瓦多的学生、医生和商人们受够了一个长期执政的军事独裁者给他们国家带来的恐惧和残暴，于 1944 年组织起公民罢工行动。在没有拿起一杆枪的情况下，他们使这位将军与其最亲密的支持者-包括军队里的人员-疏离，并迫使他流亡。

在英国人离开印度之后不到十年，佐治亚州的一位浸信会传道人-牧师小马丁 路德 金博士-听从甘地的教导，带领其非裔美国人同胞开展为期十五年的游行和抵制运动，以颠覆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做法。

在金博士被暗杀后几年，通过采取为苏联集团很少遇到的新的社会行动方式，波兰的异议人士反抗共产党人的统治。后来，工人们罢工并赢得进行组织的权利，导致团结工会的产生以及共产主义最后的终结。

在波兰的变革酝酿发酵的同时，阿根廷的一群妈妈们被她们的政府在其儿子失踪问题上的沉默激怒了，开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心广场上游行。她们一直到该国的军人政权的合法性受到削弱时才停下来，这导致政府在福克兰群岛战争溃败之后倒台。

当阿根廷的将军们倒台时，在安第斯山对面的智利，奥古斯托 皮诺切特将军正面临蓬勃兴起的民众运动，而该运动对其独裁政权发起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最后，通过一次他按道理讲不会输掉的全民公决，它们将他赶下台。

在半个世界之远的地方，在费迪南德 马科斯于 1986 年盗取菲律宾的一场选举之后，一位被暗杀的反对派领袖的寡妇带领几十万人走上街头。他们支持由具有改革意识的军官所发动的叛乱，让那位独裁者没有任何机会去凭借暴力维持权力，而且他逃离了该国。

在菲律宾人重新赢得他们的民主体制之后不久，通过组织抗议和抵制并建立他们自己的社会服务网络，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军事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提出挑战。这一波非暴力抵抗行动成了巴勒斯坦起义的最大的组成部分-即便这是最不显着的部分。



在团结工会继续抗争的同时，南非的抵制的组织者、工会和宗教领袖携手发起反对种族隔离的非暴力运动。与国际制裁一道，它们有助于迫使当局释放纳尔逊 曼德拉，并就民主的前景展开谈判。

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几天，成千上万的捷克学生坐在布拉格瓦兹拉夫广场的边缘，反复唱道：“我们没有武器......世界正在注视着。”几周之内，该国的共产党政权以及东德、匈牙利、保加利亚乃至蒙古的与之相像的其他政权都烟消云散了。

在 1990 年代，一位缅甸母亲-昂山淑姬-在还处于软禁状态时领导了她的国家的民主运动，当时，在抗争中支持缅甸年轻人的是一个新的由非暴力活动人士和实践者所组成的世界性群体。

在 1999-2000 年间，在海外民主团体的支持下，一个由学生领导的抵抗运动和一个统一的政治反对派动员起来，在投票站击败斯洛博丹 米洛舍维奇总统。由于其安全部队因非暴力叛乱而失去效能，在面临着大罢工的情况下，欧洲的最后一位独裁者投降了。

无需暴力而获胜的可能性在上述所有抗争中都存在，而每个故事中的突出人物之间的互动决定着这种可能是否会变为现实。从德国的钢铁大王到智利的摄影师，从列夫 托尔斯泰到戴斯蒙德 图图，从丹麦国王到田纳西州的市长：他们以及这些故事中所描绘的几十位其他人都起到了作用。毕竟，我们叙述的是个人的言论和做法：那些激励或领导运动的人士的激情；他们所战胜的独裁者们的傲慢、狡诈和最终的耻辱；以及二十世纪“人民力量”次第展示过程中被人发现的那些天生的才能、愚蠢的失误以及令人震撼的牺牲。

一位著名的非裔美国人牧师及其妻子在 1936 年拜访了莫罕达斯 甘地，曾一度问他非暴力抵抗是否是“一种直接行动的方式。”甘地铿锵有力地回答道：“它不是一种方式，它是唯一的方式......它是世界上最有力的行动力量......它是比电还要积极的力量，甚至是比穹苍更为有力的力量。”这好像是说，他没有将它设想为信念的产物，而是视它为一种带有可应用之法则的科学，并在应用时产生可以预料的力量。

人们通常会想当然地认为，对非暴力抵抗手段的选择是出于道义上的原因，但历史记录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二十世纪采用非暴力行动的大多数人这么做的原因是，武装或者物质力量不是一种可行的办法。有些人只是缺少足够多的武器来发动暴力反叛；其他人则在最近看到暴力抗争的失败，并给生命和财产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可是，因为攸关人们最为重要的利益，且因为他们决心将统治者赶下台或者取消压制他们权利的法律，他们就被迫拿



起其他非暴力的武器。那些在我们的故事中采取非暴力行动的人士不是要缔造和平。他们是要战斗。

冲突

在二十世纪跨越海洋的重大战争之前、之中和之后发生了一系列其他的冲突，这些冲突不是出现在国与国之间，而是在国家内部，并且无关征服或者意识形态，而是关乎自主、免受一个党派或者族群支配的自由、以及民主。在新闻和娱乐媒体因而也是我们的集体记忆中，这些冲突受到战争、种族屠杀、地毯式轰炸和恐怖行动的遮蔽。然而，我们讲述的故事中所采用的非暴力惩处行为与二十一世纪冲突战略与策略的相关性远远大于战壕中反对德国皇帝的战斗、太平洋上的海军决战或者印度支那丛林中的游击战。

本书不是一部关于非暴力行动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二十世纪所有冲突的全面历史。相反，每一故事都表明，非暴力的惩处行为是如何可能成为一种削弱和罢黜看似难以应付的对手之战略的生死攸关手段的。通过所有这些冲突，关于非暴力之力量和实践的长达一百年的观念演变过程都可以追踪到。本书前三部分的构成是为了说明非暴力行动是如何被用于三类主要冲突之中的。

第一部分-迈向权力的运动-讲述非暴力的惩处行动是如何在二十世纪三次伟大的改变国家的民众自主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反对帝国王朝的运动，印度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以及波兰的反对苏维埃体制的运动。

第二部分-抵抗恐怖行动-阐述在国家暴力达到顶点的二十世纪中叶，公民抵抗者是如何抗击军事占领者或者统治者的。它讲述德国人是如何在 1920 年代阻挠入侵的法国和比利时人，丹麦人和处于德国占领之下的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民是如何在二战期间颠覆纳粹政权的，以及萨尔瓦多人是如何在 1944 年罢黜马丁内斯将军的。而且它追述阿根廷人和智利人是如何在 1970 和 1980 年代打击那些也穿着制服并让其民众感到恐怖的统治者的。

第三部分-权利运动-描述非暴力的惩处行动是如何在二十世纪后半期被用于反对许多政府以争取权利的：美国的民权运动是如何松动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做法的，南非的黑人多数族群是如何推翻种族隔离制度的，菲律宾人是如何驱逐独裁者并恢复民主体制的，巴勒斯坦人是如何抗击以色列对被占领土的控制的，以及中国、东欧和蒙古的民众力量是如何挑战他们国家的一党制政权的。



第四部分-暴力和力量-考察两个相反的案例。在这两个案例中，选择暴力反抗或者恐怖手段的运动通常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和政治损失要远远多于它们收获的权力。它还探究先进的技术、国际制裁以及其他变动中的条件是如何可能让那些在二十一世纪采用非暴力力量的人士增强影响力或者受到限制的。

每一故事的主线是那些采用非暴力行动的人士与其对手之间的一系列交锋。我们的有些故事是关于这些缓慢成长的运动的：它们在使用非暴力力量时表现出很大的动能和灵敏性，但是却为了长期的梦想而放弃短期的收益。其他故事则是有关那些快速组织起来的运动的：它们的带领人是卓越的业余选手，但却似乎迅速地克服一切不利因素。不过，在所有案例中，决定其命运的是每一方所选择的制裁措施中所内含的战略。

上述故事所展示的连续性并非只在二十世纪末才是清晰可见的。推动事件演变的领袖们常常从早前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激励甘地的是俄罗斯 1905 年所发生的事。非裔美国人的领袖们去印度学习甘地的策略。当智利人在 1980 年代组织起来反抗奥古斯托 皮诺切特将军的独裁政权以及菲律宾人组织起来反对费迪南德 马科斯时，他们受到理查德德德 安腾巴罗的电影甘地的影响。

甘地面对的是英国的殖民统治者-这一对手非常不同于丹麦人所面对的德意志国防军。美国的民权领袖们有法律和美国宪法的支持-这一优势是波兰团结工会所没有的。不过，上述冲突中的所有非暴力参与者都采取非常类似的方法来达成不同的目标，而且由他们的经历所凝练成的教训都有违于传统的看法：

对非暴力惩处手段的使用比通常设想的要远为频繁和普遍。它们都是世界每一角落和二十世纪每个十年期中的创造历史的斗争中的关键组成部分。

非暴力行动在反对所有类型的压迫性对手方面都发挥了功效，而且下述两个现象之间没有相关性：针对非暴力抗争者所使用的暴力的强度，和它们最终获胜的可能性。有些经受最残暴对待的非暴力行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非暴力运动试图将暴力纳入其战略时，它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一旦一个政权受到致命力量的攻击，它聚合内部的支持并展开镇压的能力就会提升。

动员和维持一个适合于非暴力行动的民众运动应与强化公民社会和建立或延续民主体制同步进行。



尽管存在着上述事实，民众的想法还是一直纠缠于两种关于非暴力冲突的错误观念。首先，既然二十世纪的两位最为人所称颂的非暴力运动领袖-甘地和小马丁 路德 金-都是因为宗教上的呼召而崛起的，非暴力行动被定型化为一种道德上的偏好，而非一种讲求实用的选择，因而模糊了它在冲突中的战略价值。其次，自马科斯于 1986 年垮台以来，对大规模非暴力行动的新闻报道所造成的印象是，“人民力量”来自城市街道上躁动不安的人群的规模或能量。尽管从身体上对抗一位对手可能是必要的，有效非暴力行动的真实韵律是自发性弱而目的性强，戏剧性弱而技术性强。它与大喊口号和将鲜花插在枪管上没有什么关系。与它有莫大关系的是让政府与它们的控制手段分离。

许多人预测，二十一世纪将会出现一系列激烈但却是地方性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主张收复国土者试图攫取原有的土地，族群党派会争取独立，或者不满的少数族群会寻求安置自己的代言人。不过，所有地区性利益通常都是以渴望权利的形式表达的。民主大国认为，如果权力建立在自治的基础之上，那么权利就能够自由地加以争取。如果确保民主总是问题的解决办法，那么下述哪个做法更有优先性呢：是让冲突各方保持原有状态，还是提倡卷入冲突的办法以至于更有可能结出民主的果实呢？

在至关重要的人类利益一直处于竞争态势的世界上，冲突会发生，而且只要人们相信暴力有助于他们获胜，暴力就会被用于冲突之中。如果另一种更为有效、无需付出暴力代价的获胜方法获得更广泛的认可，暴力就会开始被看作是为某一事业而奋斗的一种较为不合理的方法。由于假定所有的冲突都会趋向于暴力，大部分政策制定者迷恋于削减武器或者解决冲突，将它们看作是减少致命性暴力的主要途径。可是，在二十世纪的十好几场重大冲突-双方在其中争夺对某一国家之前途的控制权-中，战略性的非暴力行动而非暴力是具有决定性的争斗模式。既然暴力作为冲突的手段可以被替代，减少暴力的目标不一定总会因另一项任务而受到拖累：化解冲突的根源。

“能够发挥很大的能量”

本书讲述的是，二十世纪的人们是如何发展出无需使用暴力而夺取权力的能力的。我们的每一则故事聚焦的都是非暴力行动在更大的冲突中的运用。为了说明非暴力力量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必须有选择地突出特定的事件和人物-他们对我们故事的重要性高于他们在他们的时代或地区的整个历史上的重要性。然而，我们没有故意低估其他那些在更广大的历史背景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或故事的影响。比如，我们没有想要给出一部关于南非种族隔

离制度瓦解的完整历史。我们确实努力要做一个公平和富有启发意义的报告，说明非暴力行动是如何被用来帮助实现上述结果的。

所有历史著作都受其作者的视角的影响，我们的作品也不例外。在第一、第二和第三部分，我们试图让事实本身说话，并将我们的大部分分析性思考留给每一章的总结部分。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是评注性资料和解释性观念的混合体，而这些资料和观念是针对由非暴力行动改变世界的方式所引发的更大问题的。对于拥有下述观点，我们无须自责：如果被有效地加以运用，非暴力的惩处行动能够终结压制并让国家和民众获得解放，而且相比于诉诸暴力叛乱或恐怖手段，他们能够在做到这一点时面对更少的风险和更大的确定性。可是，它们不是总能发挥效用，当这样的时刻和我们的故事有关时，我们不会逃避谈论这些时刻。

我们还认为，非暴力抵抗应该得到比它已获得的所有关注更多的关注。在我们的时代，暴力会制造更多的新闻，因为对许多人来说，历史被视为是一出戏。不过，如果历史被更为普遍地视为是一个过程的话，那么非暴力的惩处行为的动态效果就会更容易获得认可。这种力量形式并不神秘；它施展的现实性与大部分人生活状态的现实性没有不同，而且由于这个原因，它是可以理解的。与犬儒式想法相反的是，非暴力行动的历史不是一连串的绝望的理想主义者、偶尔出现的烈士以及少数有超凡魅力的解放者的历史。真实的故事是关乎普通民众的，他们被吸引到伟大的事业中来，而这些事业是从头开始一点点发展起来的。它讲述的是人们离弃工作待在家中或者占领他们的工厂和办公室，拒绝带身份证件，在他们的地下室印刷简讯，以及当他们被告知要离开时并不离开。

打破英国人盐业垄断的印度人、阻挠纳粹军事运输的丹麦人，组织起来反对独裁政权的智利人：许多采取过非暴力行动的人士凭直觉就意识到，力量源自他们做过什么，而不只是源自那些坐在宫殿或者总统官邸中的人士做过什么。以非暴力力量方面的杰出理论家吉恩夏普的话来说，“非暴力行动是可能的，并且甚至能够针对无情的统治者和军事政权发挥出很大的能量，因为它打击了所有等级式制度和政府最薄弱的方面：对被统治者的依靠。”4 在上个世纪终结时，世界上的无线波段和书店中充满了回顾所谓历史上最具破坏性之一百年的素材。一卷卷的图书和一页页的文字向我们展示了大屠杀的情景-据说，这是战胜邪恶的可怕代价。可是，如果只以那种方式讲述的话，二十世纪冲突的历史将会加重一个可怕的错误：也即只有暴力才能战胜暴力，攸关最高利益的抗争必须以武装力量来完成。然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这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在同一个世纪，拥有可以想象到的



所有暴力武装优势的统治者和压迫者们在所有大陆上都被那些没有诉诸暴力的人士排挤出局？

有关冲突的最大的错误观念是，暴力总是力量的最终形式，而且推进正义事业或者击败非正义的所有其他方法都无法超越它。可是，俄罗斯人、印度人、波兰人、丹麦人、萨尔瓦多人、非裔美国人、智利人、南非人以及其他许多人都证明，冲突中一方的选择并不因另一方使用暴力而预先被限定，而且其他的非暴力措施可能是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如果上个世纪被迫做出的生命和名誉方面的巨大牺牲在未来的一百年间有所回报，这其中的原因就将是，上述真理得到了更为充分的理解。

（本书翻译：刘获、张大军、任星辉、范冠萍；校对：张大军）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一五一十编辑部：非暴力抗争历史

1920	印度	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
1939-1945	丹麦	不论在印刷品或在公开场合上，抵抗与不合作都成为丹麦人对占领军的主要响应方式。让纳粹无法从占领中获得利益。
1950-1970 年代	美国	美国黑人为争取与白人同等的地位，而发起经由非暴力的抗议行动的群众性斗争运动。
1973	希腊	当年 11 月，雅典理工学院的学生组织起义，号召推翻军人独裁政府，遭到血腥镇压。次年，军政府倒台，希腊转型为民主共和制。
1977	阿根廷	1976 至 1983 年间阿根廷大约有三万个左派学生、知识分子、记者、工人消失，被称为“肮脏的战争”自 1977 年起每星期四下午，丧失儿女的母亲们静静地拉起抗议的布条，在阿根廷总统府前的五月广场（Plaza de Mayo）绕圆行走。
1986	菲律宾	菲律宾知名反对派领袖阿基诺被暗杀，导致总统马科斯丧失民心。阿基诺夫人代替其丈夫参选总统。马科斯自知胜选无望，在大选中舞弊。大选舞弊曝光，民众组织大规模示威，要求马科斯下台。由于军方保持中立，失去军方支持的马科斯被迫流亡海外（史称"人民力量革命"）。
1987	韩国	1980 年的光州事件（由大学生发起），遭到正规军的血腥镇压。到了 1987 年，全斗焕在民众的压力之下，被迫修宪，终于结束军事独裁。
1987	巴勒斯坦	在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发生的最大规模的巴勒斯坦人抗暴运动，其中包括自我组织和公民不服从运动以及军事反对行动（巴勒斯坦争取家园运动）



1988	智利	全民公投迫使皮诺切特下台。
1989	波兰	80 年代初期，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日渐壮大，占总人口 1/3。团结工会不断地发动大规模全国性罢工，波共被迫承认其合法地位，允许团结工会参加大选。当年 6 月 4 日，团结工会在议会选举中获压倒性胜利（拿下参议院 99%的席位），获得了总理职务及组阁权。次年 1 月，波共第十一大召开，宣布解散。次年 12 月，瓦文萨当选波兰总统。
1989	东德	东德开始出现大规模民众抗议，并有大量民众越境逃往西德。德共总书记昂纳克被迫于当年 10 月辞职。继任总书记克伦茨宣布开放两德边境。当年 11 月，柏林墙"倒塌"。次年 3 月，德共在大选中失败，沦为在野党。次年 10 月，东西德统一。
1989	保加利亚	首都民众示威，要求全面政治改革。总书记日夫科夫被迫辞职。次年 1 月召开的保共第十四次（特别）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实行"多党制"和"市场经济"。
1989	捷克	首都布拉格的民众在反对派的号召下，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为"布拉格之春"平反。在民众的压力下，党内激进改革派占上风，总书记雅克什被迫下台，中央主席团集体辞职。当年 12 月，举行全国民主选举，反对派领袖哈维尔当选总统（史称"天鹅绒革命"）。
1990	蒙古	受东欧剧变影响，蒙古出现全国性的示威游行。蒙共主席被迫辞职，蒙古放弃一党专政，转型为多党民主制。
1992	南非	南非白人政府为了压制黑人的反抗，于 1985-1990 年实施全国紧急状态。但收效甚微。1992 年，白人德克勒克总统意识到军事手段无法压制黑人反抗，被迫与非国大谈判，并宣布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南非于 1994 年举行不分种族的全国大选，非国大领袖曼德拉当选首位黑人总统。
1998	印尼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印尼经济崩溃。全国各地爆发大



		规模排华骚乱，导致 499 人死亡。5 月 19 日，印尼大学生首先发难，要求苏哈托引咎辞职。上万名大学生包围并占领国会大厦。苏哈托召集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内务部长等实权人物开会，要求实行全国军管。此要求被军方拒绝。2 天后，执政 32 年的苏哈托被迫辞职。
2000	塞尔维亚	米诺舍维奇不承认败选，被民众赶下台。
2011	突尼斯	茉莉花革命
2011	埃及	受突尼斯影响，埃及爆发 30 年来最大的全国性示威，执政 30 年的穆巴拉克垮台。

【回到目录】

【视频】Scilla Elworthy：非暴力抗争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主编：方可成

编辑：王菡，季文仪

设计：潘雯怡，池春荣

校订：常仁豪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论坛理事杜婷、梁文道、闾丘露薇、周保松。除了一五一十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